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5月31日第10期

总第15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柳岸夜

王爱和作品 纸上油画 颐和园 一九七五

《记忆》156期

目录

【专稿】

[乔晞华 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

[姜义华 毛泽东晚年改革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实践](#)

【字清谈画】

[王字清 那些年，我们是怎样画画的（一）](#)

——1949-1979年间不让画什么画

【评论】

[郭小林 从狼变为人——宋彬彬、刘进们道歉之后的思考](#)

【述往】

[阮丹青 一个红小兵的故事](#)

[杜厚勤 我没有上过高中](#)

[王丕忠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六）——西部地区筑铁路](#)

【资料】

[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26中）红卫兵（卫旗）破旧立新一百例（1966年9月1日）](#)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2月7日）](#)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2月23日）](#)

【编读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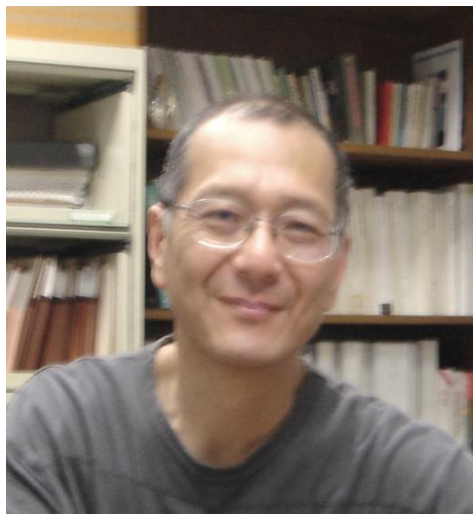
1. [本刊编辑部感谢胡鹏池、唐少杰的纠错指谬，为156期封面的误植道歉](#)

2. [赵惠中对《北师大文革大事记》的修改意见](#) 3. [不平答越人](#) 4. [越人答不平](#)

【本刊声明】

【专稿】

作者简介：



乔晞华，南京外国语学校1968届初中毕业，1989年赴美留学，1992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现美国某州司法部研究人员。主要著作：《西方社会学面面观》(2013)；《总统制造——留美博士眼中的美国大选》(2014)；《傲慢与偏差——66个有趣的社会问题》(2015)；《多棱镜下：中国的电影与时装、时尚》(2015)。《即非一个文革，也非两个文革：南外红卫兵打死工人王金事件个案分析》(2015)。

文革的暴力、真相与和解

乔晞华

1966年9月29日，南京玄武建筑联社三队工人王金因多捡了两张传单，被南京外国语学校的31位红卫兵打死，此事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王金的工友们成立了“9·28调查团”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要求当局惩办凶手。在舆情的压力之下，南京当局不得不逮捕三名为首的红卫兵。调查团有效地扼制了南京的红卫兵暴力，在时间和自发性上超过了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总司”。王金事件是典型的老红卫兵施暴事件，与北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案”相似。本文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分析文革中的暴力，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就人们争论不休的“真相与和解”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 三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在继续讨论文革暴力之前，本节先介绍三个著名的心理学试验。第一个是阿希实验¹。这是研究从众现象的经典心理学实验。自愿者被告知，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情况。当实验者走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七个人先坐在那里了，其实这七个人是跟研究人员串通好了的“托儿”。研究人员要大家做一个非常容易的判断，比较线段的长度。他拿出一张卡片，上面画着一条竖线，然后让大家比较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从三条线中找出与这条线一样长的那条线。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很明显，正常人很容易做出判断。但是在两次正常判断之后，七个“托儿”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实验者开始迷惑了，他应该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附合别人呢？研究结果发现，平均有 37% 的人判断是从众的，有 75% 的人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判断错的可能性还不到 1%²。

为什么人会从众呢？首先是社会规范的影响。遵循社会规范可以得到褒奖，违背社会规范会受到惩罚，所以人们尽力与社会的多数人保持一致。其次是社会信息的影响。一个人与众人保持一致，他与众人的关系就会密切，众人可以给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一个人与众人对着干，人家就不会为他提供信息，包括小道消息。最后是当判断有难度时，人们更容易听取旁人的意见。从众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和民众的正确判断能力，成语“人云亦云”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从众现象。

从众心理的作用大小取决于三个因素。参与的人数越多，人们越容易从众。如果线段实验不是七个人而是 70 个人，那么实验者从众的可能更大。参与的团队对于个人也很重要。在线段实验中，如果七个托儿是自己尊敬的人（如老师和长辈），从众的可能越大。参与的人关系越密切，影响力也越大。如果小组中的人是自己的好朋友，从众的可能也会大一些。

¹ 阿希从众实验(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 也称为 Asch Paradigm), 指上世纪 50 年代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 在实验室里做的一系列从众实验。

²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gram_experiment

第二个实验是米尔格拉姆实验（也称为权力服从研究）¹。该实验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²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的三个月后。米尔格拉姆设计该实验，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也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面对违背良知的命令时，人性能发挥多少作用。³

实验的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参与者扮演老师的角色，负责教导一位学生，事实上学生是实验人员（即“托儿”）。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的房间，他们无法看到对方，但是能够隔着墙壁通过声音进行沟通。老师有一个电击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如果学生回答正确，老师会继续测验。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电击的电压随着学生错误的增加而升高。当学生被电击后，会大喊大叫，甚至敲打墙壁。当参与者试图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照以下顺序这样命令他：一、继续；二、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三、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四、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如果听到四个命令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实验便停止。否则，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压提高到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停止。⁴

在进行实验之前，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以为只有少数人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电压。他还对14名高年级的本科生和他的同事进行民意调查，受访者与米尔格拉姆一样，都以为只有少数人会狠心用高电压惩罚。实验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在实验中，65%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的惩罚极限。⁵后来米尔格拉姆和其他心理学家做了类似的实验，

¹ 米尔格拉姆实验（The Milgram Experiment on Obedience to Authority Figures，也译为米尔葛兰实验），是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上世纪60年代做的非常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

² 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 1906-1962），纳粹德国前高官，犹太人大屠杀中的主要负责人，二战后逃到阿根廷，1961年被捕受公审，1962年被绞死。

³ Milgram, Stanley.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pp. 371 - 378.

⁴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gram_experiment

⁵ Milgram, Stanley.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pp. 371 - 378.

结果都差不多。¹这位心理学家认为，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争论很重要，但是法律和哲学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如何行动。以上的实验告诉我们，当普通人面临良知和命令相悖的窘境时，人们会选择听从命令，而不是抗拒命令跟着良知走。

心理学的研究与法律和道德有联系，但并不是一回事。以下的事例说明了心理学与法律和道德的区别。1989年2月5日深夜和6日凌晨，东德人克里斯·格夫洛伊和他的好友克里斯汀·高定试图翻越柏林墙逃往西德。不幸的是，他们被东德的边防军发现了。因格·亨里奇与另外三名卫兵开枪射杀了格夫洛伊，并打伤了高定。高定受伤后被捕判了刑，四名卫兵因功获奖。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柏林墙很快倒塌了。两年后，卫兵们因为杀人罪而受到审判。因格·亨里奇因射杀受害者被判了刑，他的律师辩称，亨里奇仅仅是执行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则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后来亨里奇上诉，获得缓刑。²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警察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能力，这是他应该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对此持批评意见的人士认为，卫兵因格·亨里奇只是东德指挥系统里的最底层，放着上层负有更大责任的头目不抓，只抓下层士兵显然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正像德国谚语说的，“小人物绞死，大人物逍遥法外”³。

¹ Blass, Thomas. 1991. "Understanding Behavior in the Milgram Obedience Experiment: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Situation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0, No. 3, pp. 398-413.

Blass, Thomas. 1999. "The Milgram Paradigm After 35 Years: Some Things We Now Know about Obedience to Authorit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No. 5, pp. 955-978.

Burger, Jerry M. 2009. "Replicating Milgram: Would People Still Obey Today?",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4, No. 1, pp. 1-11.

² Kinzer, Stephen. 1992. "2 East German Guards Convicted of Killing Man as He Fled to West", *The New York Times* (1992-1-21),

<http://www.nytimes.com/1992/01/21/world/2-east-german-guards-convicted-of-killing-man-as-he-fled-to-west.html>

³ New York Times News Service, "2 Border Guards at Berlin Wall Guilty in Slaying", *Chicago Tribune* (1992-1-21).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1992-01-21/news/9201060750_1_chris-gueffroy-judge-theodor-seidel-ingo-heinrich

第三个实验是斯坦福监狱实验¹。该实验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浦·津巴多²主持，于设立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这是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志愿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报酬。有上百名应征者被招到斯坦福大学面试，接受一系列心理测试。24名健康、正常的人被选中。他们绝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部分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从24人中间随机抽出15人，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九人饰演囚犯。志愿者们被告知，如果饰演囚犯，他们可能会被剥夺公民权利，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医疗护理。饰演囚犯的人在某个周日等在家里。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他们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随后被带到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的模拟监狱。³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囚犯”第二天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们照着做了。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他们的衣服，拿走他们的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他们空着手清洗马桶。⁴

实验中三分之一的看守显示出虐待狂倾向，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这类性格变化被称为“路西法效应”⁵。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⁶当津巴多的同事克莉丝汀娜受邀来到实验场所进行观察时，她对实验的道德进行了质疑。津巴多提前终止了仅进行了六天的实验。

该实验显示出恶劣的系统与环境所产生的潜在毒害，能够让好人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一个平凡、正常且心智健全的年青人会被诱惑干出可怕的事情。在同样的环境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出不可思议的坏事。善与恶之间的界线原本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但是

¹ 斯坦福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于1971年8月14日至20日在斯坦福大学内进行。

² 菲利浦·津巴多 (Philip Zimbardo)。

³ 菲利浦·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孙佩姣、陈雅馨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8），第51-63页。

⁴ 《路西法效应》，第85-113页。

⁵ 路西法效应 (Lucifer Effect)。

⁶ Wikipedia. <http://zh.wikipedia.org/wiki/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却向人们证明，这条界线其实相当脆弱¹。

二. 是天使还是魔鬼？

王金事件中的红卫兵们的变化又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是外界环境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是被诱发的，产生作用的则是文革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环境力量。在受到强烈渗透影响之前，每个人可以说都是一张白纸，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坏的。正如津巴多所说，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的社会环境中，本性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好人会突然变成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受害者。通过引导、诱使或者传授的方式就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当好人沉浸在整体环境时，环境力量会挑战我们的人格、个性和道德观的稳定性及一致性，从而影响人性的表现，引导人做出非理性、愚蠢、自毁、反社会、不计后果的行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向我们显示了环境的重要性，社会环境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和心智上产生的巨大作用力，其作用力的巨大足以使我们做出不曾而且不可预测的可怕行为。²从表面上看，我们每个人在许多事情上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但是事实上，社会才是真正的主使。我们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社会的控制。社会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就像气候影响我们穿衣一样，我们可以选择穿红色的内衣或者黑色的外套，但是季节和气候却决定着我们是穿夏装还是冬服。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说过，在生活游戏中我们可以决定出什么牌，可是把牌发到我们手中的却是社会。³如果手中是一副烂牌，很难打败对手。

外界环境与社会制度无关。类似文革暴力事件的恶行不仅仅发生在专制国家，也会发生在民主国家。这是因为外界环境是由系统创造的，系统提供制度性的支援、权威和资源，使系统能够顺利运作。那么谁要为系统负责呢？在斯坦福监狱实验里，发生的一切恶行应该由实验的领导者津巴多教授负责。是他使狱卒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虐待囚犯。如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问题可能复杂一些，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集团的责任。系统权力是

¹ 《路西法效应》，第 257 页。

² 《路西法效应》，第 276-278 页。

³ Macionis, John. 1991. *Sociology*, 3r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p.11.

授权，是制度化许可，规定哪些事可以做，违背规定会受到哪些处罚。这些规定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所以系统常被视为是合理和正确的。¹

美国军队虐待和警察虐囚事件是最好的例子。2004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揭露驻伊拉克美军虐待战俘事件。美军宪兵勒令伊拉克战俘站在箱子上，战俘被蒙上头，手上连着电线。宪兵威胁说，如果战俘从箱子上倒下，就会被电死。战俘还被迫进行人体堆叠，组成金字塔。2015年4月12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黑人青年佛莱迪·葛瑞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被警察拘捕。在运送过程中，警察没有给他系上安全带，用手铐将他的手和腿锁在一起，并多次拒绝给他提供医疗护理。葛瑞的脊椎受到严重损伤，于一周后死亡。葛瑞之死引发了该市大规模的黑人抗议活动，最后酿成大暴乱。

虐待事件暴露后，美国军方高层立即定调说，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海外美军是模范生，犯下虐待的败类不到百分之一，参与虐行的是少数流氓军人。巴尔的摩的警察暴力事件被媒体揭露后，六位警察受到起诉。事件看起来只是个别人所为，但是津巴多教授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发生虐待事件倒霉的只是低阶的宪兵，而创造出政策的高官们、提供意识形态并批准虐行发生的上层人物却能全身而退。²美国警察的过度暴力臭名昭著。这些都与系统有关，军队和警察拥有一般人没有的权力，滥用权力成为这些系统的传统。

问题是：如果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系统内的个人应该负责任吗？如果在一个历来没有人权的文化，一个充斥着暴力的文化，一个以向当权阶级献媚为荣的文化中，把暴力的责任归咎于个人是否合理？在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里，年青人是否要对被强行灌输价值观所作出的恶行负责？如果群体行为是环境的产物，个人是否要为没有对抗环境而负责？³

斯坦福监狱实验还说明，我们以为人有基本不变的善性，能够抵抗外在的压力，并以理性的方式评判和抗拒环境的诱惑。我们以为在善恶之间有一道坚实的围墙，“我们”在

¹ 《路西法效应》，第296页。

² 非力浦·津巴多，2008，《路西法效应》，第472页。

³ Thurston, Anne F. 1990. "Urban Violen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o is to Blame?"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by Lipman, Jonathan N., and Harrell, Stevan.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170-171.

善的一边，而“他们”、“别人”、“另类”在恶的一边。其实，由于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不受环境力量的影响，我们会对环境力量失去警觉，从而开启堕落的大门。我们都会置身事外地想像自己的可能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进入社会力量的网路中，想像的行为表现与实际能做的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斯坦福监狱实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抛弃“善良的自我”能够抵御“恶劣环境”的幼稚想法。环境能够影响别人，同样也会影响我们自己。历史上出现的暴行，世界各地发生的暴行，斯坦福监狱实验无不说明：人类的人性和仁心会屈服于社会的力量。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一些环境中，这些恶行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

这一结论并非为邪恶开脱，而是让一般的行为者共同承担邪恶的责任，让我们意识到邪恶不是暴君和恶棍的专利，邪恶不仅仅属于“他们”，而且还属于“我们”。¹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所有的人都不能免于受到环境的影响，谦虚的态度永远比毫无理由的骄傲更好，才有可能承认我们在环境力量面前不堪一击。²美国加州帕洛阿图市的一所高中历史老师和爱荷华州莱斯市的一位小学三年级老师做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³

前面我们讨论了好人变恶的原因：一是外界环境的影响，二是善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那么，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呢？也就是说，“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三字经》开头两句是“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相信这一点。我们常认为人生来是天真无邪的，有的人变坏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的不良影响。当然，荀子对“人之初，性本善”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他比较赞同“性本恶”的说法。不过，他的看法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普遍赞同“性本善”的说法。西方人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人来到世上带着原罪，因此人的本性是恶的。

津巴多提出，在这场古老的辩论中，我们应该站在哪一方？人类是性本善但受到邪恶社会诱惑而堕落，还是性本恶因社会而得到救赎？他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我们每个人都

¹ 《路西法效应》，第 277-278 页。

² 《路西法效应》，第 332 页。

³ 《路西法效应》，第 349-351 页。

有可能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支配或服从，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是社会环境决定我们哪种心理模式和潜能会得到发展。各种系统塑造着人，地理、气候、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等支配着人，每天面对的特殊环境也在改造着人，这些力量与人的互动改变着人。人的堕落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可能，为恶和为善的冲动构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¹许多研究残酷暴行的学者认为人类身上存在着暴力的种子，这是扎根于人类本性的伤害别人的倾向，而国家的作用是阻止人类的这种害人倾向。有人评论法国人在卢顿女巫审判案²中表现出的疯狂时说，人们做出恶行需要的只是当局的默许。³

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魔鬼。文革的大环境使中国人的另一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全都变成了魔鬼。南外的31名红卫兵在王金事件中的表现固然可憎，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无论谁处在他们的位子，表现不会好到哪儿去。

三. 真相、和解与宽恕

“一半魔鬼，一半天使”的说法并非为文革中的害人者推卸责任。文革中的害人者应该怎样面对过去的错误，他们是否应该道歉和忏悔的问题目前存在着争论。余杰认为，像余秋雨这样的名人应该为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而忏悔。也有人认为忏悔是个人的事，如果觉得需要，可以像教徒那样在密室里去忏悔。⁴而更多的人则认为，忏悔是必要的。不仅是名人，凡是做过坏事的人都应该忏悔。文革中伤害过他人的人都应该反躬自省，有所表示。忏悔说到底是为了过失者自己，虽然不能抵消过失，但是可以使人的道义立场发生转变。⁵

北京外国语学校有八位同学在四十四年后写信向他们的老师道歉，忏悔了当年参与暴力迫害的行为。从他们的忏悔和道歉可以看出，犯错不大的人压力轻一些，容易忏悔和道

¹ 《路西法效应》，第368页。

² 卢顿女巫审判案 (The Loudun Witch Trials)，法国1634年。

³ Thurston, Anne F. 1990. "Urban Violen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o is to Blame?"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by Lipman, Jonathan N., and Harrell, Stevan.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150-151.

⁴ 于坚，“忏悔是个人的自由——为余秋雨一辩”，《华夏文摘增刊》第224期（2000年）。

⁵ 徐友渔：《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华夏文摘增刊》第224期（2000年）。

歉。¹陈毅之子陈小鲁的公开道歉及时跟进的宋彬彬道歉又一次引发了争论。陈小鲁是文革中干过坏事的干部子女中第一个道歉者，他的道歉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虽然仍有人认为还有不完备之处，不能洗清西纠的罪恶。²但是宋的道歉却遭遇冰火两重天的反应。有人称之为“宋之一小步，中国一大步”³，但也有人对她的道歉进行谴责，主要的原因是她的道歉重心落在澄清和辩解上。人们对她道歉的真诚性表示怀疑，从而不接受甚至责难她的道歉。⁴

在忏悔和道歉问题演变为当前的公共话题时，更有人把注意力放到了文革的责任和罪错上面，因为目前的忏悔和道歉只是停留在个人层面上。根据沃尔德教授的调查，文革期间75%的死亡是按照官方意志执行的，如党委、革委会或军管会的命令。这类组织都有正式的领导人，如党委书记、革命会主任、军管会主任。为什么鲜有应该对文革中大量的迫害事件负责的官僚出来忏悔和道歉？文革中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案件完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有些甚至是当局的决策。高层的决策人在领导国家机器吞噬无辜公民时是完全一致的⁵，无论是激进的毛林集团，还是文革中被清洗的刘邓保守集团，或者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集团。因此有人提出，虽然忏悔和道歉并不是坏事（因为有罪才会有忏悔和道歉），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罪是怎么犯的，谁是主谋、谁是协从、谁是追随者，然后才能谈忏悔和道歉。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固然应该忏悔他们那时在革命信仰支配下的行为，为他们的行为而道歉，但这种忏悔和道歉不是主要的，更应该忏悔和道歉的是制造当年的错误信仰、领袖崇拜和革命迷信的始作俑者。⁶

对陈小鲁和宋彬彬道歉的不同反应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的分裂状况。文革之恶未得到清算，大量的红二代、官二代独占资源、独享特权，社会仇富仇官心理盛行，尤其是改革以来官权独大，腐败蔓延。而中共三十多年来的政策造成了真相掩蔽，是非不清，文革遗留

¹ 王友琴：《“带了好头”：红卫兵道歉》，《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2日。

² 杜钧福：《陈小鲁的道歉不能洗清西纠的罪恶》，《华夏文摘增刊》第926期（2014年）。

³ 启之：《宋彬彬道歉之后》，《记忆》第112期（2014年）。

⁴ 徐友渔：《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腾讯文化》2014年1月15日。

⁵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

⁶ 单正平：《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当代中国研究》总82期，第23-37页（2003年）。

问题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¹中国的年青人需要从外国学者那里才能够知道文革中发生的事实真相。我们应该趁着迫害者和受害者们都还健在的时候讲出真相，这才有可能达成社会的和解²和社会矛盾的缓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文革中发生事情的记忆开始淡忘，知道真相的老一代人也逐渐凋零³，再不抓紧时间，文革中许多事情的真相可能会随着他们的去世而成为永远的迷。鉴于中国的政治状况，目前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追究责任，不是讨论是否应该忏悔和道歉，当务之急是搞清真相，为后人研究文革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

而搞清历史真相与消除怨恨、仇恨最终达到和解紧密相关。近三十年来，世界上不少国家经历体制转型，均曾面临旧政府犯下的暴行问题。如果暴行的终止和体制的转型是由于军事上的胜利，那么胜利的一方往往以刑法审判解决历史问题（如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后审判了内战战犯）。但是如果暴行是以和谈而终止的，大多数国家以“真相与和解”的模式来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⁴，应运而生的新模式值得我们中国人借鉴。

“真相与和解”的模式基于一个假设：使民众理解过去有助于曾经相互为敌的民众之间的和解，了解过去能使民众放下历史的包袱轻装迈向未来。有学者通过对南非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民众中接受过去事实真相的人更倾向于采取和解的态度，种族间互动的人群更容易达成和解。⁵

该模式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 如何处理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和个人；2. 如何面对有些负有责任的人员至今仍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现实。解决的方案有三：1. 全面赦免；2. 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审判；3. 成立委员会负责发掘事实真相，找出受害者和害人者，给予有限的、有条件的赦免。⁶显然，第三种方案更受欢迎。该方案追求的不是惩罚性公义，而是修复性

¹ 启之：《宋彬彬道歉之后》，《记忆》第112期（2014年）。

²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忏悔吧》，《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5月刊。

³ Unger, Jonathan. 200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Grass Roots."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uary 2007), pp. 109-137.

⁴ Sooka, Yasmin. 2006. "Dealing with the Past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Building Peace Through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8, No. 862, pp. 311-325.

⁵ Gibson, James L. 2004. "Does Truth Lead to Reconciliation? Testing the Causal Assumptions of the 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Pro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8, No. 2, pp. 201-217.

⁶ All Truth is Bitter. A Report of the Visit of Doctor Alex Borain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o Northern Ireland. 1999.

公义。¹惩罚性公义把罪行看成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修复性公义把罪行看成是个人之间的冲突²，通过改善个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和解。“真相与和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将来再次出现类似的暴力。

虽然同为“真相与和解”模式，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采用的具体方法是有差异的。有的国家对追诉的时间设定限制，但也有国家不设限制（如乍得和乌干达）。有的国家对害人者的身份加以保密（如智利和瓜地马拉），有的国家却公布他们的身份（如东帝汶），有的国家对几十年来某种形式的暴力行为进行调查（如智利和南非），有的国家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如南非和塞拉里昂），有的则是小范围内进行（如瓜地马拉、斯里兰卡和海地）。相对于个人之间忏悔、道歉和宽恕，“真相与和解”模式的好处是忏悔、道歉和宽恕是在非对抗性的和不具危险的环境下进行的。³有的国家通过“真相与和解”模式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当权者至今不道歉，对受害者说对不起（如萨尔瓦多）。⁴

和解不仅包括真相的揭露，还包括受害方的宽恕。宽恕分两个层次⁵，第一层次没有受害者和害人者之间的互动，是单方向的。西方人叫做“恨罪恶，爱罪人”⁶，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对事不对人”。第二层次存在害人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互动，涉及害人者的改造和救赎。和解最大的障碍是仇恨和报复心理，甘地曾说：“以眼还眼会使世界都变瞎。”⁷

世界各地出现的“真相与和解”模式均在联合国或本国政府的主导下开展的。而中国政府对文革的真相一直采取回避的政策，美其名曰“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给

http://www.healingthroughremembering.org/images/pdf/All_Truth_is_Bitter.pdf

¹ 惩罚性公义 (Retributive justice)，恢复性公义 (Restorative justice，香港人译为复和性公义，台湾人译为修复性公义)。

² Gade, Christian B. N. 2013.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the 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Proces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2(1), pp. 10-35.

³ Pascoe, Danial. 2007. “Ar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s and Effective Means of Dealing with State Organized Criminality?” *Cross-sections*, vol. III, pp. 93-115.

⁴ Cuevas, Victor E., Rojas, Maria L. O., and Baesa, Paz Rojas. 2002. “Comparative Study of Truth Commissions in Argentina, Chile, El Salvador, Guatamala and South Afric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ictims, their Relatives,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nd Experts”.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http://www.apr.ch/content/files_res/Truth%20Comm_Executive%20Summary.pdf

⁵ 即怜悯 (Mercy) 和赎罪 (Atonement)。

⁶ Hate the sin, but love the sinner.

⁷ Jakopovich, Dan. 2011. “A Humanist Defense and Critique of the 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Peace Studies Journal*, vol. 4(1), pp. 51-65.

文革研究界探索真相带来了难度。尽管探求真相的呼声不绝，但是鲜有勇敢的害人者站出来吐露真情的。根据各国的经验，没有赦免就没有真相，这是真相的代价。¹

和解还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²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文革的真相与和解只能在民间进行，只能是自下而上的和解。在没有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寻求真相与和解虽然有很大的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有效的途径是，我们应以真相为首要目标，通过妥协达到目的。既然民间无法追究害人者的责任，而政府也藉口追诉期已过不再追究，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放弃追究责任呢？我们放弃追究、放弃谴责，目的是为了真相浮现。没有赦免，当年的害人者谁愿意出来坦承事实的真相呢？宋彬彬等人主动出来道歉（尽管有澄清和辩解之嫌），相对于那些至今遮遮掩掩、默不作声的大多数老红卫兵来说是进了一大步。可是他们却并未受到欢迎，反而受到更多的指摘。这样的做法只会阻碍更多的人出来道歉，阻止更多的曾经的害人者站出来吐露真相。

这里有必要提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巴比特推行出台的“倒奖励”制度。该制度重金奖励迅速上报自己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飞行员、机械师、地面指挥等航空从业者，不仅免除本该对他们的处罚，而且还奖励 200 到 1000 美元。该决策虽然遭到高层的强烈反对，但是在巴比特的坚持之下获得通过。该措施极大地鼓舞了有关人员的“自我揭露”勇气。据统计，截止 2013 年底，“倒奖励”支出高达 6100 多万美元，然而却极大地降低了美国民航飞行的事故发生率，避免了近三亿美元的损失。³

如果我们鼓励那些敢于站出来忏悔、道歉、揭露自己恶行的害人者（哪怕他们的忏悔并不诚心，他们的道歉并不实意，他们的真相并不完全），对他们表示宽恕，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出来讲真话，使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真相。为了保护这部分人，我们还应该让他们

¹ All Truth is Bitter. A Report of the Visit of Doctor Alex Borain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o Northern Ireland. 1999.
http://www.healingthroughremembering.org/images/pdf/All_Truth_is_Bitter.pdf

² Staub, Ervin. 2006. "Reconciliation after Genocide, Mass Killing, or Intractable Conflict: Understanding the Roots of Violenc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and Step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7, No.6, pp. 867-894.

³ 徐竞草：《价值 3 亿美元的“倒奖励”》，《37°女人》2014 年第 6 期（转引自《读者》2014 年第 15 期）。

以匿名的形式道出真相，做到对事不对人。在本书第一章中，南外王金事件的论述采取了匿名的方式，丝毫没有影响事件的真实性。

姓名只是一个符号，人的姓名是可以变更的。例如，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岩，南外的31名红卫兵中也有多人更姓改名。一个姓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例如，对于圈外人士来说，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凶手名单中排在首位的三名红卫兵的名字仅仅是一个符号，与叫他们第1号、第2号和第3号红卫兵没有什么区别。王金事件中，第4号红卫兵是个女的，文革初期时是初一学生，干部子女。她骂骂咧咧一直追到男厕所，被其他红卫兵赶了出来。第7号红卫兵用木棍狠捣王金的腹部四五下，打断了三根体操棒，第6号红卫兵的体操棒毒打王金时断为三截。第15号红卫兵更狠毒地把皮带蘸水狠抽王金。这样的细节足以说明当时的暴行。我把这种真相叫做“南外模式”。卞仲耘案的真相可以参照“南外模式”进行揭露。如第X号凶手打了卞老师n拳，第X号凶手用穿着大皮鞋的脚踢了卞老师一脚，要了她的命。这样的真相记载足以向我们的后人讲述文革的暴行。

名字并不重要，惩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揭露暴行的真相细节。我们再不抓紧，真相将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逝去而成为永远的迷。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将一无所获：既不能惩罚凶手，又没有揭露暴行的真相。

政治是妥协。按照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¹的说法：“政治决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法得到何物。”换句话说，政治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只有通过妥协、合作、协商来实现。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愿望不可能全部实现，因此在斗争中会有输有赢。“妥协”和“胜负难料”是政治的两大特点²，没有“舍”就没有“取”，没有“失”就没有“得”。

按照“南外模式”探寻真相，我们失去的是我们原本就得不到的，我们得到的却是历史真相，是可以永远留存的历史真相！■

¹ 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1902-1978)，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

² 张程、乔晔华，《总统制造：留美博士眼中的美国大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专稿】

毛泽东晚年改革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实践

姜义华(复旦大学)

一. 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的构想

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改变国家体制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或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对此，《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巴黎公社实行的全面的选举制》的资料中介绍说：“巴黎公社实行了全面的选举制。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¹

为文化大革命作进一步发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巴黎公社原则的宣传、强调不断升温。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²巴黎公社原则直接等同于所谓“大民主”，即《人民日报》所反复强调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¹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5日。

²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¹工矿企业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代表的产生，“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²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酝酿夺权时，起草“夺权宣言”的执笔者以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评价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为依据，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张春桥当选社长，姚文元当选副社长，当日发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称：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崭新的地方国家机构”，是“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做官当老爷的权利。”《宣言》更提出：“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什么折衷主义、改良主义、调和主义、温情主义，统统要打倒”，“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³

巴黎公社不仅为“大破”（即“全面夺权”）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大立”（即“新政权”）的建设树立了榜样。当时许多工厂按照巴黎公社的选举方式，建立了小组、车间、科室的“革命生产委员会”，其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如“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

¹ 王力、贾一学、李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12月14日。

² 《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

³ 《解放日报》1967年2月5日。

工会服务员等”，“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姚文元在给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在上海夺权中，“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¹在此后成立的中央各部、各省市革委会中，一般都取消了部、局（司）、处等设置，而代之以各种级别的小组，如政工组、宣传组、生产组等等。

1月22日，陈伯达在对北京部分学生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他还介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进城的时候，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地下命令。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段，是群众接管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明确提出：“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盘踞的烂掉了一些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²在这里，巴黎公社原则更突出强调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内容。

二. 巴黎公社“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原则的限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中共中央竟多日保持沉默，《人民日报》对《上

¹ 1967年1月20日姚文元起草的《上海工作简报》，转引自霞飞《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小史》，《党史天地》2008年第5期。

²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1967年第3期《红旗》杂志。

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词。毛泽东将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于1967年2月12日至18日与他们多次谈话，就上海人民公社名称和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等问题委婉却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自己思考的结果。这事实上是对原先巴黎公社式构想的首次重大修正。

关于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很明显，这就是告诫他们，巴黎公社“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经验不适用于当下的夺权斗争。

基于此，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一个反动的口号。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地改了嘛！他说，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地改善。这是对“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更直接的批判。毛泽东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相当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哪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呢？只能是这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这种“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要被人家怀疑，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

与此相应，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废除各种“长”的做法，指出，不管叫什么，总是有领导人，总有干部。他在谈话中还反对让一个普通的工人、学生直接管理一个地区、一个学校提出了异议，说：一个工人同志，他不管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也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的贡献，但是马上把一个城市，比如说上海市，或者一个省，比如江苏省，交给这样的一些工人同志来管，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嘛！如果他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就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这个困难当然大。我看[让大学生]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全校的情况也还不了解。这则是对巴黎公社民主选举领导人的方式的质疑。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的群众，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一估计则更使“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立论完全失去根据。

关于公社这一政权组织形式或这一名称，毛泽东这时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他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他还指出，苏联的苏维埃，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英国是君主制，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其他还有很多事例都表明，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为此，他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叫国务院，这不必改名字了。市仍叫市人民委员会，这也不要改了。

三. 巴黎公社“大民主”原则的重新厘定

文革起始，是否实行所谓“大民主”，被视为是否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分水岭。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¹

所谓“大民主”，1966年8月，按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的规定，就是“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在第七条中，更将压制“四大”，如“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

¹ 《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说成“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众所周知，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因为这一点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

《人民日报》曾就此发表社论说：它“贯串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¹。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原就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原就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是群众路线的第一步。可是，文革中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却是对一直行之有效的党的这一群众路线的否定。因为它所信任、所依靠、所放手的“群众”，都有特定的内涵，特定的界限，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更将群众运动与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将群众中的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割裂开来。

¹ 《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

群众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整体，它由无数取向不同、利益不同、组织程度不同的群体构成。文革发动时，毛泽东所依靠的群众，主要是在大学和中学就读的一批最先起来“造反”的学生。众所周知，刘少奇、邓小平就是因为派遣工作组到清华、北大等学校压制了这些学生而被指责为代表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工人、农民当时多不站在这些造反的学生一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要禁止各地“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中共中央于是9月11日发出指示，明确规定：“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凡是发生过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决不许把责任推向群众”。还要求“劝说工人、农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工人、农民这时就不在“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群众”之列。

1967年春夏间，以红卫兵为名号的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他们冲击各级领导机关，不分青红皂白地揪斗党政军领导人。同时，不同派别之间，你争我斗，发展到不断发动大规模武斗，乃至抢劫军火、屠戮对手，形成全国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于是，毛泽东指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警告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求学生“复课闹革命”，各单位组织“大联合”，进行“斗、批、改”。这是对于学生运动或红卫兵运动的首次重大厘定。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特地指示加了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

彻底揭露。”红卫兵中一大批活跃分子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纷纷被逮捕关押审查。这是对学生运动或红卫兵运动中最激进、最极端的那些派别直接动用专政武器。

但混乱局面并未中止,反而愈演愈烈。至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决定,由北京六十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至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这是对学生运动或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也是更为全面的厘定。这与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因为派遣工作组进驻学校而被指责为不相信群众和镇压学生运动,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在校大中学生一毕业,除极少数外,都被动员到农村去,一部分进国营农场,大部分去农村插队落户。到1978年,将近2000万青年人上山下乡,成为道道地地的农民。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至少对于广大青年学生说来,从来就没有真正适用过。这时,自然更不适用。

其实,对于广大工人、农民说来,情况也不例外。那些肯定或基本肯定各地方、各部门领导及其工作的工农组织,被视为“保皇派”,不被信任、不被依靠,更不容许放手发动。起来“造反”的各种不同派别,被信任、被依靠、被发动的程度也经常完全不同。同一组织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被信任、被依靠、被发动的程度也常常迥然有别。1976年清明节期间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发生的“四五运动”,是一场以工人、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被作为反革命事件而被取缔,更彻底暴露了文革中所倡导的“信

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理论上与实践中是多么混乱和虚妄，不得不一次次做出重大的调整乃至根本性的厘定。

1954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真正的民主，就是不折不扣、毫无例外地保障每个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文革前，公民确实并没有真正而充分地享用这些自由权利，需要做的确是切实保证每个公民依法享有这些权利。

文革中却并没有这么做。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对于揭露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黑暗面，应当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跌到社会底层，对群众生产和生活真实状况、群众的疾苦和意愿，有了深切的了解。但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剥夺了几乎所有被揭发、被冲击、被打倒、被专政者说明真相、澄清事实、辨明是非、维护自己应有权利的自由，它也没有要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者必须负起应当担负的法律责任。结果，顶着“大民主”的旗帜，言论自由常常演变成为纵容和保护一些人利用“大鸣大放”，对他人肆意谩骂、攻击、诬陷，收集只言片语，采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方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对方无限上纲，罗织罪名。出版自由常常演变成为纵容和保护一些人利用大字报、小字报、传单、自办的报纸和刊物、自编的资料和书籍，自吹自擂，污蔑他人，散布谬论，蛊惑大众。集会自由常常演变成为纵容和保护一些人随意召开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批判会、斗争会，以及其他公开的、秘密的五花八门的会议，筹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以街头政治根本破坏法治法制。结社自由常常演变成为纵容和保护一些人随心所欲地拉帮接派，自立山头，以组织革命造反群众组织为名，行四分五裂、争权夺利之实。游行、示威的自由，更演变成为一些人用来给大批斗、大审查、大抄家、大游街、非法关押、动用私刑、实行“逼供信”、普遍打倒提供合法外衣，制造“群众意愿”、“群众专政”的假象。简言之，这种“大民主”，导致宪法和法律被无情践踏，无政府主义、民粹

主义、群体暴力活动恣意泛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使“文革”中“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以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负面或破坏性效应恶性膨胀。毛泽东总结文革两大问题，一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二是全国全面内战。造成这两大问题的直接原因，不能不说，就是实行了“放手发动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以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这个“大民主”。后来，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虽然一再努力加以补救，对这个“大民主”不断给予新的厘定，收效终究有限。

四. “百代都行秦政法”的新思考新总结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的召开，是因为认定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现在需要巩固已取得的成果。

然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为了在权力再分配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在大会结束后，立即开始了激烈的争夺。1970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6 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双方斗争白热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构建者陈伯达因为追随林彪集团在全会上即垮台，最终导致发生 1971 年林彪仓惶出逃的“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的覆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原先建立巴黎公社式国家机器的理想已完全破灭。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陈伯达期间，周恩来总理 1971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外交部、中联部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开展对于托派的研究，因为托派影响很大，现在托派在青年中还有煽动性，一定要进行理论上的驳斥。1972 年，他主张要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左”时，再次提出要批判托派理论。这是一项意义极为深长的建议，名义上是批判陈伯达和国际上的托派，实际上直指陈伯达所精心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因为只

要对照一下托洛茨基相关论述，就不难看出，陈伯达所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点，好几项直接从托洛茨基那里脱胎而来。尽管周恩来批判极“左”的主张被江青集团和毛泽东本人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原创性却根本动摇。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究竟该怎样构建，毛泽东重新做了思考。这一思考集中地表现在1973年8月5日毛泽东所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十批》（即《十批判书》），郭沫若从1943年中至1945年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系列论文汇编，包括《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等。书中对法家“法术”、“君主本位”思想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持否定态度，对孔子及儒家则多所褒扬，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

柳宗元的《封建论》则高度评价秦始皇：“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

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柳宗元特别指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除去柳宗元的《封建论》，毛泽东还推荐同时阅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一、章太炎的《秦献记》、《秦政记》。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一劈头就论秦实行郡县制：“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王夫之指出：“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阴阳不能偏用，而仁义相资以为亨利，虽圣人其能违哉！选举之不慎而守令残民，世德之不终而诸侯乱纪，两俱有害，而民于守令之贪残，有所藉于黜陟以苏其困。”“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而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

章太炎的《秦献记》讨论焚书坑儒事件，《秦政记》则专论秦代国家治理。章太炎认为：“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始负宸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嗟乎！韩非道‘八奸’，‘同床’、‘在旁’、‘父兄’脱然也。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外，高于世主。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章太炎还指出：“自法家论之，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韩非有之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

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¹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简、蒙恬而已矣。岂无便辟之使、燕昵之谒邪？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就此，章太炎进一步申述道：“建国之主，非起于帅茅，必拔于缙绅也。拔于缙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帅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帅茅、缙绅所能拟已。”

综合柳宗元、王夫之、章太炎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借如何评价秦始皇，在国家机器应该怎样构建问题上，传达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一，“秦政法”结束了传统的封建制，开“公天下之端”。这是因为“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打破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的固有格局，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承担国家治理重责，使“治民之纪”得以成为“天下之公”。秦虽然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其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后宫之属，椒房之嬖，便辟之使、燕昵之谒，皆不得干政；帝王子弟亲友，“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这是使天下为公而不致天下为私的基本保证。其三，治国必须坚守法度，应当警惕“拔于缙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帅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绳墨”。这两种人，无论是坚持等级森然的社会政治秩序，还是特别喜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都是依法治国的大敌。之所以“百代都行秦政法”，正因为秦代建立的这样一整套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制度有助于达到“天下为公”的目标，所以它方才能够行之百代而不衰。

先前一直憧憬巴黎公社式直接选举及“大民主”，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之付诸实施，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结果，经受的是一一次次极为严重的挫折，并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无休无止的动乱，正是在这一空前规模的社会政治实践基础上，毛泽东重新审视两千多年来国家治理体制的是非得失，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应当怎样改革，得出了和先前迥然相异的新的结论。他所选定的《封建论》等四篇历史文献说明，就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¹ 《显学篇》

而言，坚持“秦政法”更容易达到“公天下”和天下大治的目标。《七律》最后告诫“莫从子厚返文王”，那是告诫千万不要像殷周之际那样各地方各部门分裂成无数诸侯国，各自割据一方，彼此争斗，混战不停。这当然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毛泽东这首七律写于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会议各项报告、文件已完全来不及吸取毛泽东新总结、新思考，而且，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及时理解和消化这些成果。大会以后，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如起用邓小平等功臣宿将，大军区司令互相调动以防止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得过久，召开四届人大并恢复原先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国家政治体制等，都表明，毛泽东在努力将他的新总结、新思考付诸实施。

但是，毛泽东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由韩非在《八奸》中所说的“同床”、“在旁”、“父兄”等组成的江青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毛泽东上述一系列重要决定的贯彻实施，并借机发动所谓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掩盖和扭曲毛泽东的新总结、新思考真实内容，以大量虚妄的信息混淆视听，干扰毛泽东在改革国家政治体制上做出更深入更系统的诠释。

尽管如此，毛泽东这番思考的价值仍然不容忽视，更不容否定。尤其结合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在国家机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全部实践，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这番思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国家治理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部分，还是失败的部分，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并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的历史资源与思想财富。■

【字清谈画】

那些年，我们是怎样画画的（一）

——1949—1979 年间不让画什么画

王宇清

禁忌，折射着一种文化的优劣，深浅和特性。绘画在中国，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禁忌。譬如，就在笔者的父辈或祖辈的那个年代里，绘画无论欣赏还是创作，都和现在的我们大不相同。谈论 1949—1979 年间与绘画有关的往事，可谓千端万绪，不如就从禁区——艺术上之种种禁忌，在曾经的日子里绘画创作及欣赏中的禁忌谈起。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禁忌总在不断变动。例如，要在 1949—1979 年间画画，或仅仅只是进行艺术欣赏，都确曾有太多的禁忌在等着你。这些禁忌虽有着种种名目，却基本上都和当时的意识形态、政治形势紧密关联。所以国人当时总是随时通过反面例子，来确定该如何“正确”地去“画”，以及“一致”地去“看”的。

日常生活中，革命气氛在 1949 年之后日渐升温，意识形态的激进化造成革命观念越来越贬斥绘画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是那个时空下的所谓“毒草”。那时的美术批判指出：“毒草”类绘画“以绚丽的色彩，迷人的情节，歌颂帝王将相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以及他们腐朽糜烂的宫廷生活，为他们评功摆好，宣扬才子佳人的‘儿女私情’、‘悲欢离合’，完全抽掉了阶级内容”。这种画“麻痹劳动人民的思想，使劳动人民认敌为友，忘记阶级斗争。使青年迷恋于‘儿女私情’……”这还了得？这样画画在当时属于重大的思想错误，是绝对不准“出笼”的！

好，下面几幅就是所谓的“毒草”。看看当年被指“放毒”的“黑画”都长个啥样儿？





《龙凤呈祥》，吴少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8 年 9 月新 1 版。定价：1 角 8 分



“和平演变”一直是国家的重点防范，被指为“裹着糖衣的炮弹”，被定性是推行“和平演变”工具的作品，自然一定要在禁忌之列。用当年美术批判的话说，这类画的问题就是“不去歌颂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生动事迹”，“不去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业绩”，

“把剥削阶级的臭男臭女捧上画面，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剥削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等等。

下面附录的这几幅画，或多或少都带有上述批判所列“政治问题”。这样的作品被驱逐出画坛，甚至遭到严厉批判，在那段特殊时空里丝毫不令人意外。





《钓鱼》，李慕白，上海画片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定价：1角3分



《看菊花》，章育青，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8 年 9 月。定价：1 角 2 分

还有以祈愿太平祥和为内容，源自传统题材的作品。1949 年以后，这类作品曾大量出

版印刷，但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空气的越来越浓，这样的画作也逐渐销声匿迹。



《我们热爱和平》，李慕白，上海画片出版社 1954 年。定价：1800 元（旧币）

“破除四旧，把封建糟粕扫地出门”这句时代语录之所以依然言犹在耳，在于它不但强劲彪悍地震动了当时，还潜移默化影响了某些人自此之后的理念……

下面的画，就是传说中的“四旧”了。曾几何时，这些画都因一度被指控为“腐朽没落”的代表，而沦落风尘，成为“必除之而后快”的“封建糟粕”。



《十二生肖》，忻礼良，上海画片出版社 1955 年 7 月。定价：1 角 3 分



《和合》，谢之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2 年 8 月。定价：1 角 3 分



《年年如意》，李慕白、金雪尘，此画系1950年代外销画，此张为出版校样。

西方人认为，历史是向前的，是线性发展的，很多中国人却认同历史的轮回。历史的究竟，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一直都是永恒之诱惑。

回忆，关乎历史。

如何记忆历史，则关乎未来。■

【评论】

从狼变为人

——宋彬彬、刘进们道歉之后的思考

郭小林

某种意义上，原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刘进她们的道歉有些代人受过的意味：一是代那些打了卞校长而至今不肯承认的学生受过，二是代那个制度受过。第一种情况的那些人不值得一说，这里讨论第二种情况。

宋彬彬、刘进她们就“文革”中发生的殴打、揪斗、侮辱老师的行为，尤其是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一事，向自己的老师、向全社会道歉，是很值得嘉许的事情。说明她们有认识、有担当，未尝不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完善。

道歉一事曾经“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如今过去一年有余，风浪似已平息。但是，波光粼粼的水面反射着大部分光线，往往让人很难看到水下的内容。我们试图拨开水面，对于什么原因导致的所谓“花季少女”突变而为“狰狞打手”这个现象做一点思考。

母狼：封建法西斯专政具有绝对兽性

我们认为：根本的一点，是没有人的观念，没有人权意识。人在权力者眼中只是工具（文革前提倡“驯服工具”或曰“齿轮和螺丝钉”、“我是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只是奴隶、只是猪狗、只是狼……自古而然，于今为烈。

不容忽视的是在事件背后隐藏着的权力——权力天然地具有兽性，绝对权力具有绝对的兽性。“四人帮”把持的正是封建法西斯的独裁权力。他们心目中只有胜利者和敌人这两个认识范畴，非此即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杀人——杀敌人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受良心谴责的。他们用所谓的“从大乱到大治”的荒唐逻辑，鼓动起天真幼稚的孩子，去打人、杀人……这与我们深恶痛绝的塔利班、IS 诱惑孩子去当人体炸弹有什么区别！

由此可以推论，要说道歉的话，最该道歉的不是宋刘，甚至也不是那帮高一、初二动手打人的孩子，而是执掌权柄的当代希特勒！是那个法西斯专制制度！我们往往捉住了狼崽不放，却忘了喂养他们的母狼，更容易忽略狼窝——体制及文化。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求活尚且不易，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人的观念、人的意识。历朝历代的更替、那些揭竿而起的人，从来想的都是住金銮宝殿、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占尽天下美女……皇帝及大小官员毕竟是少数，位子少而人多，就争抢，就动刀兵，就杀人。君不见，秦将白起一次就“坑杀降卒四十万”，比南京大屠杀还多十万人！中国历史上有十四次人口锐减百分之九十以上，非天灾也，皆争天下而杀人也！

回头看看过去不久的咱们的革命，三年消灭了八百万“国军”，其中死者多少人，不会少于二百万吧？一场“抗美援朝”，据说我方死亡人数达七十万（官方承认是三十七万）。我们曾夸赞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但从来没有真正认可和理解过，其核心就是人要像人一样活着。其中“免除恐惧的自由”当然就是反对暴力、反对杀人、反对不义的战争。遇罗克只是要求一种平等的参加革命和建设的权利，就遭认定：“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而判死刑。

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才会“文艺复兴”——人的意识、人的概念才会产生。

人是生而平等的，人的本质、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试想，仅以那一代知青（以千万为数量级）为例，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良好的、充足的教育，而不是中断学业去“刨地球”，焉知会出现多少个爱因斯坦、李政道、丁肇中、屠呦呦啊？

革命就是暴力，就是不能把人当人，如果你面对敌人，还想着对方是人，下得了手吗？

为了维护这种杀人的正当性，营造这个权力体制的合法性，首先，他们掌握的全部宣传工具就会不遗余力地、持久地鼓吹、美化杀人，美化我方杀人者，而竭尽一切努力丑化“敌人”，直至把他们说成猪狗不如，甚至连动物都不是，是植物（如“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如“毒草”，这些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是粪土。

其次，他们垄断的教育体系，全力给孩子们灌输的就是仇恨教育，要“牢记阶级苦，

不忘血泪仇”！从文革前，刘文学为一筐海椒而与“敌人”搏斗，到文革中的《闪闪的红星》中的孩子用砍死一个成年人（因为他是敌人）……我们所受的无孔不入的熏染，都是如何“斗争”，如何“恨”……喝下去的全都是“狼奶”！养成的当然就是“狼性”！

所以在我们这些人在孩提时代，早就在基因中被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即“阶级斗争”。在这种教育（奴化教育、仇恨教育）中，“坏人”和革命者，两个词的语境是有天壤之别的，革命者是好人，但革命者比好人的概念层次高得多，而坏人不过是“臭狗屎”。注意，这里面不知不觉就把“人”的概念抽象掉了。人们从来没有被灌输“人本身”这个概念，人的至高境界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通体光明的，是高高在上的，是“一般人”（这里面已暗含贬义）无法企及的，是要当“当然接班人”的，是小小年纪就当作干部培养的。

所以，无论是打人者，还是不赞成打人的宋刘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狼崽。

那些打人者，她们当时的行为正是“爱憎分明”的表现。当政者种下什么籽，必然结下什么瓜。这也正是她们今天赖以逃避的心理避风港。

没有人的社会，必定是兽的世界

具体到师大女附中，当时卞仲耘已经被市教育局内定为“四类干部”，意即坏人，准备抛弃她了。一些高干子女得风气之先，已经喊出“卞猪头，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之类的脏话，试想，那些初中及高二的血气方刚的孩子们在满世界“打倒！打倒！”“誓死保卫！”之类口号沸反盈天的氛围之下，再结合本校运动的现实，能不被煽动起来吗？如果不跟着大伙一块“同仇敌忾”，那倒是不正常的。

宋刘等人到市里汇报死人事件，吴德说：“死了就死了。”她们听到这样的回答，也就无可奈何了（毕竟她们没有参与殴打）。她们回到学校广播了吴德的话，也有安抚众人的意思，并没有想去追究“凶手”。当时的大环境都把这个当作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压根儿没想过凶手这个概念。

所以，并不是“对卞校长保护不够……”，而是心里已经认同卞仲耘是“坏人”，只不过不赞成用这种过分的手段来对待坏人。

在当时情况下，宋刘等人没有上去跟着打，已属不易。因为她们毕竟年龄大了，懂得一点文明知识和做人的道理，觉得打人不好、不文明。但她们并没有觉得卞校长不该打倒、不该斗……只是觉得凭借批判和说理斗争就可以战胜“走资派”卞仲耘。宋刘等人把卞仲耘送往医院，只是出于“政策”的考虑，她们说：“八路军还优待俘虏……”可见卞仲耘不过是失去杀伤力的敌人而已。

如果以人为坐标画一条横线，横线以上是神、是非人，横线以下是奴隶，还是非人。在没有人的专制社会里，所有人的创造性都被压制、埋没了，只有那一个神的创造性被“超常”发挥、不正常发挥，结果把整个社会带向深渊。希特勒如是，东条英机如是，斯大林如是，毛泽东何尝不如是啊！

没有人的社会，必定是兽的世界，是虎狼横行的荒野！在那样一个“屠宰场”般的黑暗社会里，任何人的生命（遑论私人财产）最终都是没有保障的。刘少奇、彭德怀、林彪死得何其凄惨！而大权在握的毛泽东又如何？据现在披露的材料看，毛泽东最后几个月病情日重，到了口齿不清、谁也听不懂他说什么的时候，他的老婆、“最忠实的学生”江青其实是盼着他早点儿死的。他死后没几天，江青就对其喽啰们兴奋地说：“咱们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大意）

“一厘米原则”，相比较之下，我们泱泱华夏多么原始！多么野蛮！

呼唤“人”

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已超过五千元。有人在呼吁重振华夏文明，意图挽整个民族道德沦丧的“狂澜”于“既倒”。我倒觉得，我们经济复兴了，是时候了，要呼唤“人”！应当而且可能来一个“文艺复兴”——

人的解放、人性的振兴，从兽性的洞穴中把我们拔擢出来，上升而为人！

怎么能经济越发展反而越压制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呢？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觉醒。

首先是自我觉醒。我们每个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坐等是等不来的。我们自己要自我完善，充分挖掘自己的最大潜能，追求自我实现这种人的需要的最高层次。

其次，权力者要做到尊重人，把人真正当做人，爱护每一个普通人，相信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才能，都具有无限的创造潜能。无论贤愚不肖，只要国家给他提供足够的条件和机会，都能为人类做出他独特的贡献。权力者不能对无权的普通人随意滥用国家机器、国家暴力，这就要破除权力至上的体制和官本位的思想意识。其次，国家要保障每一个人享有正当而充分的自由，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给予人言论自由。再次，国家要保障每一个人（公民）天然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如选举权、监督权等等。

九十余年前，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沉痛地说过：“我们追掉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去除昏迷和残暴，要人人都享正当的幸福……”（大意）

胡耀邦先生说过：“我可以不做官，我还要做人。”他是把做人看作是比当官更高层次的、更重要的人的根本！

我们追悼顾准、遇罗克、林昭、卞仲耘等无数的冤死者，要向全世界朗声宣告：在中国这片曾几何时狼奔豕突的无人区里，如今已站立起来了真正的人！

2015年11月23日凌晨初稿

12月8日再改

【述 往】

一个红小兵的故事

阮丹青（香港浸会大学）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八岁，住在北京。我们的院子里住了几十户人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宿舍。那时候好像常常可以不上学，就在家里同小朋友们一起玩儿。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在艺术圈里，周围都是剧作家、画家、演员、导演，和从事戏剧教育的老师。那天早上，好像是小超子来找我，说是有行动。我们大概七八个男孩儿、女孩儿，最大的那个大哥哥应该十二岁了，在上小学六年级。我们要去抄家，抄地主婆的家。

地主婆是王奶奶，就住在我们院子里。她的儿子是学院里教舞台美术的教师，大概不到四十岁吧，没有结婚，也不怎么说话。王奶奶也是不怎么说话的人，母子两个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我们把王奶奶叫出来，让她老实交代，家里是否藏有变天账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动手了，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抽屉，衣柜里的东西，通通拿出来，扔到屋外的地上，一样一样的审查。记得我和小丽丽把王奶奶的塑料花一束一束的撕碎，一边撕一边笑，开心极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破坏的快感。没有人看的出来，我们这两个小女孩儿将来一个会成为主治大夫，另一个会是大学教授。那个大哥哥后来也是国企高管呢。

我们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一个大人出来管，都在上班，没上班的估计也不敢出来

说话。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就在班上挨批斗呢，他们都是“牛鬼蛇神”，是黑帮。我妈妈被关在学院里，不能回家。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奶奶的儿子回来了。他向我们请示：“我可以给这个地主婆做午饭吗？”我们批准了他的要求。我觉得特别可乐，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这些小孩子这样卑躬地说话。

下午，我们要求王奶奶跟我们去上缴我们搜到的封资修的坏东西。在胡同里，王奶奶走我们中间，我们好像一路喊着口号什么的吧，反正动静不小，不少人围观。这时候，一个中年女人突然走出人群，对我们说：“你们闹什么闹？！你们都是黑帮的子女，有什么资格批斗别人？！回家去想想你们的爸爸妈妈的问题吧！”我们一下子就愣住了。不过，我们很快就反应过来。大哥哥说：“黑帮的子女就不能革命啦？！你破坏革命运动！”她就住在附近，我们马上去了她家，把她家的门上、窗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批斗了她一番，她也只好低头认罪了。

不记得那一天是怎么结束的。几个月以后，听说王奶奶的儿子自杀了。好像是被告知，若是不好好交代问题，就要给他升级，会把他跟更坏的人关在一起（就是跟我妈妈他们那些院级的领导大黑帮们关在一起）。他大概是受不了，上吊自杀了，就在学生宿舍楼的后面的。那里有很多很粗的钢筋，我们常去那里玩儿，记得我们还在那些钢筋上伸着脖子试着玩，说：“王XX是在哪根钢筋上吊死的呢？嘿嘿。”

王奶奶的亲戚把她接走了，他们没有告诉她儿子去了哪里。我从此也没有再听到过她的任何消息，也没有多想这个事。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不经意地提起，当年她挨批斗的时候，她的一个学生走上来打了她一个耳光。我听到后，差点儿疯掉，好像所有的血都涌到了头上。那个学生的儿子跟我在同一间中学读书，那些日子，我天天盼着他被大卡车撞死，因为我觉得那是惩罚他的最佳方法。

直到我大学毕业，去美国读博士学位，才良心发现。我做过很坏的事情！连王奶奶儿子的死都可能同我们有关呢。他不单是自己在学院里受侮辱迫害，自己的妈妈也被小孩子

们侮辱迫害。

我的美国博士导师说，那些造成这种局面的人，造成小孩子们都可以胡作非为的局面，那些人是真正的罪人。

也许吧。

Sunday, January 31, 2016

后记：昨晚去看了电影《十年》，电影院里全是年轻人。演到第四段的时候，我在哭，而其他观众特别安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觉得非常恐怖，我宁愿这些年轻人哭出来，大哭一场。看完电影，跟一个香港朋友一起吃晚饭，跟他讲起我的红小兵经历，差点儿又哭起来了。今早跟一个犹太好朋友聊起此事，他说：“你当时才八岁，就不要责备自己了。不过，你可以把这件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也许这是我减轻罪过的唯一方式。

【述 往】

我没有上过高中

杜厚勤

五十年前，文革甫始，
我那尚未完成的中学学业随之结束。
十年文革，十年梦魇，
无法求学的痛苦时时啮噬着我的心。

——作者题记

儿子念高中时，有一次为学习的事和我发生了争执。说着说着，儿子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你又没上过高中！”噎得我顿时哑口无言。很多年过去了，我早忘了当年父子俩

都争了些什么，但儿子的这句话却长久地盘桓在我的脑际。

我的的确确连一天的高中也没有上过。1966年初中毕业，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之际，文革爆发，我的中学校园的学习生活就此画上了句号。但这岂止是我个人的遭遇！那时，整个中国大陆所有的大中学校全部被迫“停课闹革命”。时间由最初所宣布的半年延宕到后来的三年，导致该继续学业的无法继续，该毕业的无法毕业、升学，该就业的不能就业。大学的五个年级、初高中的六个年级，所有的大学生、中学生全都滞留在已停止了教学活动的校园里，空耗着宝贵的青春年华，无一能够幸免。有的人后来又有机会去读大学，但1966、1967、1968这三届的初中生里，在整个中国大陆，绝无一人上过高中！就算其中有人后来读了硕士、博士，留了洋，他也填写不出他的高中学历。五中的胡小唐就是如此，当年他曾是1968届的初中生，尽管后来成了博导，又当了天津大学的副校长。

作为中国人，如果文革期间人在海外，可以正常求学读书吗？

丘成桐，著名数学家，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其父曾在香港崇基学院任教。14岁时，丘父去世，家中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丘于是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学业。1966年，在内地所有学子全部辍学之际，相当于大陆高一年级学生年龄的丘成桐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69年，丘提前修完本科四年课程，旋即赴美留学，并于1971年获博士学位。而此时在大陆，文革已经折腾了五年，所有大学的校门依然都还紧紧关闭着。（丘成桐的这段人生经历还告诉我们，正常的社会，人的成长奋斗是要靠自己的。面对贫穷，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改变自身、创造未来，而不是企望瓜分地主的田地去攫取个人的幸福。）

在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当中，与大陆老三届年龄相当的有两位：朱棣文，1948年出生在美国；钱永健，1952年亦出生在美国。这两位，一时没有查询到他们的中学求学经历，但他们的出生年份，我辈却非常熟悉。按大陆的正常求学年龄计算，朱棣文相当于1967届高中毕业生，他后来于1970年获数学、物理学双学士学位的时间，也与此判断相差不多。这之后，朱于1976年获博士学位。钱永健，若在大陆，他相当于1968届初中毕业生，但他却在1968这一年考入大学，并于1972年获化学、物理学双学士学位，1977年获博士学位。朱、钱二人，父辈都是留美学人，有家学渊源，这或是他们较早接受学校教育的原因之一。而这样的家庭背景，当年在大陆是直接和“资产阶级”划等号的。

再看台湾。龙应台，作家，曾任台湾的文化部长，1952年出生，相当于大陆的1968届初中毕业生。她于1974年大学毕业，然后赴美继续攻读学位。李安，著名导演，1954年出

生，相当于大陆的1967届小学毕业生。1969年他考入高中，1972年高考落榜，1973年通过专科考试进入国立艺专影剧科。1976年毕业，在服兵役两年后又赴美深造。龙父，1949年去台时任国军宪兵连长；李父，曾是国民政府江西崇仁县长，1951年只身逃往台湾。这两位父亲如果不走，绝无好果子吃。

丘、朱、钱、龙、李们的中学、大学学业以至更高的学历，大都是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完成和获得的，如果当年身处大陆，又将会面临怎样的一种境况呢？他们还能正常地读中学、考大学并顺利完成自己的学业吗？他们还有可能创造出后来各自所拥有的辉煌吗？

以上所举各例都是名人，此处并非眼红他们的成就，而是因为一时查找不到海外普通华人的相关例子。但毋庸讳言的是，我所羡慕的就是他们彼时有幸没有生活在大陆。当年，无论是在香港、台湾，还是在欧美国家，所有华人、华裔的海外“老三届”们，因远离大陆文革浩劫，而得以按部就班地完成他们各自的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学业，从而为自己未来的人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看看他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同为中国人，同是上学读书的年龄，为什么竟有如此之大的境遇差别呢？同是炎黄子孙，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反倒不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呢？

回望1930—1940年代的中国，日本侵华，国土沦陷，抗战军兴，全民奋起。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华东、华中、华南，半个中国已再难寻觅一张平静的书桌。然而，彼时神州大地的琅琅读书声却始终不绝于耳。在民族危亡之际，为了保存读书种子，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东部、中部的学校和老师学生迁移到西南、西北，因陋就简，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着薪火相传的事业。华人当中最先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当年就曾在西迁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读书。而且西迁的不仅只有大学，还有众多中学。国民政府将其中若干中学加以整合，分别编号，以“国立”命名，由教育部直接拨款，其中还包括学生的食宿生活费用等款项，以确保战时艰苦环境下的办学条件。

再对比1966—1976年间的中国大陆，从教育瘫痪，到各行各业全都受到波及、冲击，致使工农商学兵全部卷入，整个国家等同进入全民总动员状态，但却既无巨大天灾出现，也并无大规模外族入侵的战争发生。文革，到底有多大的鸟事，竟要让亿万之众全都放下手中之事而围着一个人转？！

而今，不少文革的亲历者都不曾意识到自己是那场劫难的受害者，在他们看来，中国发生文革理所当然。八零后、九零后不知文革为何物，听到父辈讲斗批改、抄家打人、牛

棚、上山下乡仿佛听天书。1981年，中共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颁布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共最高层对这场革命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中，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最信赖的激进主义同伴“四人帮”，原来两个是叛徒（江青、张春桥），一个是流氓（王洪文），一个是文痞（姚文元）。

在民主政制的国家（地区），公职人员、政界人物，首先是最高领导人，如果有任何一点瑕疵，哪怕就是生活道德方面的问题，都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批评，乃至下台滚蛋。尼克松因水门监听事件被迫辞职，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贿赂事件被弹劾，克林顿因绯闻向社会公开认错道歉。而中国大陆，和平年代里整死、害死、杀死、饿死达天文数字的人之罪魁祸首，居然还在被歌功颂德。两相比较，仅此即已彰显中国大陆与西方国家、与海峡对岸、与整个文明世界的巨大差距。连文革这一页都翻不过去，中国大陆不可能走出丛林，不可能迈向文明、开启未来。

“老三届”作为一个群体概念，从表面上看，是指文革之初因运动爆发导致停课而滞留校园的初中、高中各三个年级的所有学生，就本质而言，则是基于这个群体曾在适龄读书的时段被整体剥夺了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权利的共性特征。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受教育权的被剥夺，导致了人生命运的逆转，尽管看似一个个阅历丰富，但却处处充满着匪夷所思而又毫无意义的人间磨难，由此形成了“老三届”这一群体的整体人生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讲，老三届不仅是文革的受害者，更是制度的牺牲品。如今，岁月如流水般逝去，我辈已然不会再有什么奢求。但如果在这人生的最后一程依然看不到前边的一丝光亮，那就意味着，我们曾经遭际的苦难还有可能会以变换的形式而加以延续，我们的后代还要在暗夜中继续地摸索下去。■

【述 往】

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六）

——西部地区筑铁路

王丕忠

巴王河大桥

大队宣布要抽调一部分犯人去西部筑铁路，犯人中起了一阵骚动。凡点到名的人第二天不出工，一清早便编队整理行李，准备出发。劳改犯的调动，有时比军队的调动还紧张，几乎不给喘息的余地。可是当时我的心情却十分舒畅，调到一个新地方，换一个新环境，即使劳动仍然艰苦，精神上的折磨可减少，因此好像要去远途旅游一样地高兴。我把破破烂烂的东西收拾好，等待出发。午后通知集合，按新编制排成纵队，步行到总场指挥部，从各分场各大队抽调来的几百人都在此集中，并重新编队。

从分场到总场指挥部步行三个多小时，到达时已近傍晚，路好走还不觉很累。第二天一早在指挥部大院集合，发放单衣裤、棉衣裤和一床棉被，质量虽差，却是全新，这是出乎意料的事。我们这批犯人自投入劳改三年多以来从未发过任何东西，有接济的犯人还好，没有接济的犯人，衣服都已破烂不堪，我即其一。我在被捕时身上穿了一件丝棉长袍，后来下襟破了，剪下来做了一件背心，长袍变成短袍。这两件东西后来破得披披挂挂，露肉透风。被子也烂成一团，盖不住身子，我正在为此发愁。现在发下新衣被，对我来说，是一桩大喜事。

按我的想法，从苏北农场到西部任何地方去都要先到海州，现称连云港市，然后乘火车西行。因为苏北农场所所在的滨海县离海州不远，这条路线是捷径。可是实际上走的路线是先乘船到淮阴，乘船顺运河南下，渡过长江到达镇江。在镇江停留了约十天，住在镇江监狱。

镇江监狱中有女犯，多数是年轻妇女，在监狱中劳动。我们这批劳改犯多年没有见到女性，一旦看见了女犯，不免感到新奇。品行低劣的人甚至窃窃私语，评头论足。要不是犯人身份和纪律严格，有可能出现越轨行为。

我们住的是新建成的监狱工厂的厂房，钢筋水泥建筑，宽敞明亮。机器和设备还未安装，但水电已经接通，暂时作为我们的住所。天气是凉而未寒，地上铺了干草，睡起来很

舒服。伙食也不错，糙米饭加咸菜汤，吃起来很香。带队的干部们可能上街去逛了，没有布置劳动或学习任务。大家除一日两餐外，无所事事。有人睡觉，有人下棋看书，有人在监狱花园中散步，几年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闲适。那镇江监狱环境优美整洁，庭院中和监舍厂房四周有很多树木花草。花园很大，其中有一个池塘，旁边还有亭子和假山。由于这一切，看起来不像是监狱。据说这里是镇江的模范监狱，专关押不调出劳改的女犯和重刑犯，包括死缓和无期，生活待遇要比一般监狱好。我们这批过路客暂住此地也沾了光。

在这里悠闲的生活过了不多天，出发去西部的通知下来了，于是平静的生活又起骚动。大家急急忙忙地收拾行李，整装待命，一直等到下午才动身。步行到监狱附近铁路岔道上一个小车站，登上一列铁皮货车。这次不是专列，几节货车是挂在普通客车后面的，因此不像上次那样每站必停。这次车厢较空，车行较快，我们少吃不少苦头。一路经过南京、徐州、济南、天津、北京等地到达集宁，这就是目的地。至于为什么要绕这样的圈子，弄不清楚。这一路从出发到终点，共走了一个多月。原因是在镇江呆了约十天，另外是从农场到镇江所乘的船航行得太慢。一只小火轮拖了十多只木船，马力不够，拖不快。好在犯人对时间是无所谓的，早到目的地也一无好处，无非是早一天开始艰苦的劳动。

集宁属内蒙古自治区，旧称平地泉，在京包线上，是沟通我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集二铁路的南端起点，北端起点是二连浩特，再往北就进入外蒙国境。这里是横贯中蒙边境的山脉中的一个山口，据说这地区冬天多风很冷，因为西伯利亚的寒流通过外蒙由此山口流入我国境内。犯人的住地是在集二铁路巴王河大桥墩下巴王河畔，住的仍是A字工棚，就睡地上，好在是沙土地，很干燥。因邻近城市，所以警备森严。住地四周有电网，岗楼密布，解放军日夜看守，还有骑兵在外围巡逻。每次出工，一路上由骑兵押送。犯人如果走得慢了些，他们便大声吆喝督促并用脚踢或用马鞭抽打。这种情景即使在古代暴君政权下恐怕也难得出现，现在却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人民共和国。如今回想起来，仍不禁怒火中烧，久久不能平息。身受这样的屈辱，毕生难忘。

我们在此地的任务是加固巴王河桥南面的铁路路基，具体的工作是路基两侧帮坡。那

地段的路基实际上是个大堤，高约二十多公尺，两侧坡度在45度左右。由于过陡，坡面上的泥土经风吹雨淋，逐渐失落，坡面变成坑洼不平，宽度也因此缩小，危及铁轨的安全。因此，要把坡度扩充为30度，并须夯实加固，以免泥土失落。

这项工程的劳动主要是取土、运土、填土和打夯，看来好像简单，并不费事，事实上由于地形复杂，附近土质疏松等问题，工程进行十分困难。从事这项劳动，体力消耗极大，是民工、筑路工或工程兵所不能忍受而不愿干的苦活累活，只有劳改犯被迫去苦干。造成困难的另一原因是附近没有粘土，只用沙土帮坡不牢固，不适用，必须到很远的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去取粘土。那里地面坎坷不平，地下草根密布，挖土十分吃力。而且几百米的运输距离要在杂树丛和石块中穿行，十分费劲。我们每天干得精疲力竭，还是完不成定额。所谓定额没有依据和标准，完全由干部们凭空武断，而且都是在宁高勿低和宁左勿右的思想支配下制订的。干部们对犯人的苦难和死活置之不顾，只关心工程进度，于是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犯人在严格管制下和生命的威胁中，不敢违抗，只有逆来顺受，唯命是从。

在集宁也不知过了多少难熬的日子后，进入隆冬。当地的冬天从外蒙侵来的寒流一个接一个。犯人的驻地正当山口，遇到特大寒流，飞沙走石，眼都睁不开，天空一片混沌，寒冷自不必说。所住工棚漏雨透风，夜里冻得睡不好觉。每天清晨起身时，嘴巴附近的被子由于呼出的水气凝结一层冰。这样的严寒对犯人的威胁特别大，因为住所和衣被鞋帽等御寒的条件很差。尤其是营养不良，体力和热量消耗过多，抗寒力极弱，更觉冷不可耐。我从苏北农场调来集宁，精神上的折磨减少了，可是生活上的苦难增加了，两相比较也谈不上孰优孰劣。我自被捕以来，经过了許多阶段，换了许多环境，可是每况愈下，总是在盼望和失望、失望和盼望的不断交替中，熬过苦难的日子。

粮食定量

冬去春来，天气渐暖。再苦难的日子，只要不死，也总会过去。可是严寒的威胁刚过

去不久，一个更大的威胁接踵而来，那就是“粮食定量”。这政策对犯人来讲，是大难临头，造成不可言喻的恐慌和混乱，直接影响健康和生命。

在劳改队，“粮食定量”是突然开始的，事先并未宣布。甚至在开始实行后，干部才仅仅提出“粮食定量”这一词。为了什么？怎么办？都未说明。以往凡遇重大事情或新的政策，照例是事先开大会宣布，然后由中队布置学习，再由小组讨论，各人表态，写保证书、决心书、挑战书等等。这次却一反惯例，这些程序都未进行。所以事先大家一无所知，原因何在，不得而知。大家对这新鲜事初听之下觉得莫名其妙，古今中外所未有，有生以来所未闻。在实行之初，犯人间发生了空前的混乱和恐慌。

犯人的伙食，假日是一日两餐，平时是一日三餐。粗粮干饭，如苞米、高粱、小米之类，有时掺入白薯或马铃薯。在就餐时每一小组发给一小面盆盐水青菜汤，就靠这一点点咸味送饭。因此大家互相监督，每人轮流舀一勺，不许多舀。吃到最后连盆底剩下一些带泥沙的汤渣也吃得精光。饭菜虽极粗劣，但是犯人在一天长时间的重劳动之后，饥饿已极，因此仍然吃得很香。犯人靠此来维持生命，除此之外吃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可是，有一天，出乎意料的事，也可说是可怕的事发生了。那天下午收工回来吃晚饭时，多数人吃了两碗饭，少数人只吃了一碗，那两个大木桶中的饭由于没有盛满便吃光了。没有吃饱的人抬着大木桶到伙房去添，伙房的犯人说没有了。我一向吃不快，也只吃了一碗，没有吃饱，因此心中恼火，认为伙房不负责，没有做够饭，让大家挨饿，便随众与伙房吵闹，并到伙房里去乱翻，看看有没有把饭藏起来。可是找不到，所有盛器都是空空如也，于是告到队部。我没有去队部，因为我一向不愿见到干部们，尤其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据去的人讲，队长和指导员只听而不作声，最后才说：

“知道了，这不是伙房的问题，你们不许去伙房闹，谁去闹就处分谁。问题何在，以后会告诉你们，回去！”

到底是什么问题，谁也弄不懂。但总以为这是一时的特殊事件，决不会持久不变，也决不会再发生的，也就不去深究。当晚的风波就过去了，我可是饿得一夜不得好睡。

到了第二天开早饭时，大家由于昨晚的经验，都争先恐后地去盛饭，每人把饭具盛得满满，狼吞虎咽地吃。情况比昨晚更糟，昨晚是少数人只吃到一碗，这下是多数人只吃到一碗。而且在盛饭时，由于争夺饭勺和挤近饭桶发生了争吵，甚至动武。有人竟不用饭勺就用饭具去舀，因此饭粒撒了一地，情况一片混乱。我仍只吃到一碗，还是费尽了力气才弄到的，吃了个半饱。

各小组长把这种情况向队部汇报，队长和指导员来到现场，下令大家按小组站队，然后怒气冲冲地训话：

“你们想要干什么？想要造反？你们是有罪的人，如果再犯罪是什么问题？是抗拒改造，坚决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饭并不是不够吃，而是故意要争，有句老话‘争则不足，让则有余’，一争就造成有人吃得过多，有人吃不饱。如大家均匀着吃，饭是绝对够吃的。现在马上出工，问题晚上再说！”

犯人们深知自己是在专政之下。专政意味着什么，没有人不清楚，如果被指责为抗拒改造将导致什么后果，心里也都明白。在强大压力之下，大家不敢争辩，默不作声，心中只盼这情况决不是长久的，以后一定会好转。

当天中午收工回来吃午饭，开饭时，队长、指导员、干事等干部都来了，命令犯人按名册上的次序排好队，依次轮流去盛饭。第一轮完毕后再开始第二轮，不许争先，不许混乱。谁要扰乱秩序，就揪出来不许再吃。第一轮排在最先的人第二轮排在最后，以此类推。办法既已规定，就按此严格执行，而且每人不许自己盛饭，由各小组长掌勺代盛。我对这办法很赞成，免得一到吃饭如临大敌，一片混战。

但在，开始排队盛饭时又发现了一桩出乎意料之事，原来大木桶中装的不是干饭，而是稀饭，这是劳改队从未有过的事。稀饭很稀，里面有一些未去皮的土豆块。盛饭后我一吃是淡稀饭，没有放盐，在吃完了第三碗后，由于没有咸味感到反胃，再也吃不下去了。在此有一点须说明一下，我上述所谓“碗”其实并不是碗，而是各人自备的餐具，有搪瓷饭盆、搪瓷杯、铝饭盒等，大小不一。此外还有小面盆以至小痰盂，浙闽来的人还有用竹

木筒当饭具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我用的是一个大搪瓷杯，装饭、装水都适用。为了方便，我统称之为“碗”。那顿午饭大家轮流盛饭，绕圈子走动，你来我往，穿梭不停，边走边吃，犹如和尚道士做佛事或道场。回想起来情况十分可笑，可是当时在紧张之中没有人会有这种感觉。

这种吃饭办法由于每个人都可吃到三至四碗稀饭，肚子被水分撑饱了，饥饿的感觉暂时消失。但下午到工地后，一经劳动，小便接连而来，几次小便后，腹内空了，立即感到饥饿，全身乏力，无论挑土、装筐、打夯等都没有劲。说也奇怪，平时队长、指导员、干事经常来到工地督工，那天却不见他们来，于是大家在劳动上也就疲塌下来。

那天晚饭仍照午饭方式进行。夜间每人小便频仍，睡不好觉。早晨勉强起来，头昏脑胀，没有精神，其后一连多日都是如此。犯人们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有人甚至怀疑政府要把犯人饿死，我也曾有过这种想法。

也记不清又过了多少天，大队开会，会上才宣布了“粮食定量”政策，并说明这是由于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造成的，不单犯人的口粮要定量，全国所有的人的口粮都要定量，要大家尽力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以后情况一定会好转。至于犯人口粮的定额是多少却没有宣布。我心想这肯定有鬼，不然这最关键的事为什么不宣布？可是谁敢对这一点提出疑问！对于自然灾害这一点，也令人半信半疑。为什么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只字未提？

我过去不是多疑的人，只是由于几年来亲身所经历和所见所闻关于政府欺骗人的事很多，自然而然地对政府不信任。干部们对“粮食定量”迟迟不予宣布，可能是因为对此政策也有抵触情绪。一方面上级要求他们督促犯人完成定额，加速工程进度，一方面又不给犯人吃饱，凡有点理智和良心的人自然会认为不合情理和不人道。但是为了平息犯人不满情绪和消除开饭时发生的混乱局面，不得不把“粮食定量”政策公诸于众。“粮食定量”对犯人来讲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当时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现在为写本文，经过不断的追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犹如电影般在我脑海中一幕幕地放映出来，历历如在目前。

从此以后，“粮食定量”成为经常，成为制度，绝不允许违背和破坏。犯人先前所抱

只是暂时情况的希望成为泡影，每天无时无刻不在饥饿绝望之中。同时干部们对犯人的督促也较以前松，犯人劳动没有以前那样紧张。事实上确实也紧张不起来，身子日瘦，体力大减，不少人连路都走不动了。我从小饭量较小，这时也感到难熬。那些个子大、年纪轻、饭量大的犯人是怎样的遭罪，可想而知。犯人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天天地挨过日子，处于高压之下，默默忍受，不敢反抗。

有一天下午收工后开晚饭，稀饭是用两个大木桶盛装的，由伙房服役犯抬到大院中。其中一桶因抬它的服役犯跌交翻倒，整桶稀饭倒在地上，并向四周淌开，正巧淌到我脚边。这时，许多犯人聚拢来拿手捧来吃，因为捧不起多少便趴在地上用嘴吸。我当时由于饥饿，一冲动也想趴下来吸，但另一想法阻止了我。我想到一个人弄到这步田地也太可悲了，像猪狗一般地吃垃圾会给自己的心灵投上屈辱的阴影，留下痛苦的回忆。再说，即便多吃几口稀饭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自尊心使我背转身去走离淌在我脚边的稀饭。那大院是沙土地，不一会儿就把稀饭吸干了。可是仍有犯人把米粒连沙子一同捧起来，盛在碗内，用水漂出米粒来吃，顷刻之间，地上的米粒被刮得干干净净。

巴王河大桥南端铁路路基的帮坡工程，原计划半年完成，但是由于粮食定量，犯人体力不济，一直拖到秋天还未结束。有一天队部忽来通知，那天不出工，叫大家准备好镐、锹、担子，全体到附近老乡地里挖包心菜菜根，说是因为菜根中的嫩心削出后掺在稀饭中可使大家吃得饱一些。大家一听高兴之极，闹轰轰地到老乡地里拼命地挖菜根，一直挖到午后太阳偏西才停。大家挑着装得满满的菜根担子，兴高采烈地回到大伙房。

午饭后，全体出动用镰刀削菜根，把嫩心削出来。那嫩心脆嫩可食，很像莴笋。当晚每人多吃到一碗稀饭，而且比平时的稀饭稍稠。这样吃了约四五天后又去挖了一次，又吃了几次。好在当地老乡种了大面积的包心菜，菜根一时挖不完，此后隔些日子又去挖了几次。在这段时间内，犯人从饥饿中稍稍解脱出来。从这件事情中，犯人体会出政府好似并没有要把犯人饿死的企图，思想较为宽慰。

可是好景不长，隆冬来到，天寒地冻，菜根大多腐烂，已很难挖掘。这一救急措施只

好放弃，于是三餐稀饭又恢复既少又稀的原样。犯人挨饿劳动的严酷事实促使每人的健康急剧恶化，病员日益增加。粮食定量实行半年以后，劳改犯支持不住的现象愈来愈明显。

集宁地处山口，入冬以后寒流频频。犯人因吃不饱，体内热量不足，对寒冷的抵抗力很差，患感冒的人很多，受寒腹泻的人也多。屋后毛坑中的大小便溢出坑外冻成冰块，与平地连成一片粪水。有一次我去大便，自己解出的小便流到鞋底下很快把一双鞋冻住了。解好大便起身时两只鞋已拔不起来，只好赤脚去工具房拿了铁镐把鞋刨起，因此耽误了按时出工，受到了批评。据说这种情况，别人已经发生过，我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那时候干部把犯人生病看作是一项累赘，直接影响出工率，间接影响工程进度，因此批假极严。我有多次生病，由于病情不够严重不批假，勉强出工。如果不出工，那是抗拒改造，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而且队部也决不会听之任之，必令小组长和其他积极分子把病人死拉活推地弄到工地，强迫劳动，如敢抗拒就遭到拳打脚踢，事后还要开会斗争。

已批假的病情较轻的病人留队治疗。所谓治疗，外伤则消毒包扎，内科则给一些极普通的廉价成药，动手术或用较好的药是妄想。我那次伤脚得到较好的医治可说是极少的例外。较重病员立即调走，据说是调到病员集中的病号队。这病号队在何处？情况如何？大队的犯人是一无所知，但调走的病员从未见再回来。犯人与犯人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政策严禁私人拉拢，尤其是所谓搞小团体。而且各人自顾不暇，自身难保，谁去管别人的事。但有人透露去病号队的人都是重病号，大多数病死其中，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个谜。

55 公里

在犯人体力不济、病号又多的情况下，工程进程很慢，一直拖到次年春节才基本完成，除留下少数人做结尾工作外，其余调到西部包白线。这包白线是内蒙包头和白云鄂博间的一条运输煤和铁矿石的专用铁路。当时在白云鄂博发现了煤矿和铁矿，品位很高，于是设区开采，并建设包白线把煤和铁矿石从白云鄂博运到包头，供应包头钢铁联合企业。

这次调去的犯人约千余人，先从集宁乘火车到包头，再从包头乘汽车到“55公里”。那时包白线是已经规划，还未修建。这“55公里”是包白线上要设站的一个地点，荒山群中，没有名称，因那儿离包头55公里，便以此为名，便于称谓。

我们这批犯人从包头乘多辆卡车出发，一路上有骑兵押送，浩浩荡荡，路人侧目。起先卡车还有一条公路可行驶，不久公路没有了，便沿着一条沙河前进。那条沙河是季节河，夏秋有水，冬春干涸。河床上尽是沙石，没有泥土，车轮不会陷，但要打滑。有一处要翻过两个山头，坡度很陡，车开不上去，犯人全部下车推，卡车在边开边推中才到达山顶。下山时犯人全上了车，车子溜下山，摇摇晃晃，十分危险。我会驾驶，可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陡坡。卡车后厢的下面放行李，上面坐人，人坐在行李上已高过车厢栏杆，随着车的颠簸东倒西歪，很有摔下车的危险，令人心中发怵。

我们来到这“55公里”，仍旧是筑铁路路基。但在集宁是土方工程，这里是石方工程。我起初以为铁路是建筑在河床上，因为只有河床是平地，双侧都是山。山头一个接一个，连绵不断，看不到可以铺路轨的地方。后来才知道这石方工程是在河床一侧的山坡上开出一条切口，并利用开下来的石块填充山头与山头之间的沟豁。这样既处理开下来的石块，又省去了架设桥梁，而且运距很短，又是住下倾倒石块，比较省力。石方不须打夯，也省工不少。在山坡开切口，是用镐挖的，石头表层经风化很松脆，很容易挖。整个工程比集宁的帮坡土方工程好搞。

这一段路基是全线的重点工程，在此要填满两个很深的山沟。山坡上风化石挖完后，里面是未经风化的坚硬石头，用镐挖不动，便打炮眼填入炸药炸开。每天炮声不断，工地上硝烟弥漫，犹如战场。据说当时石方的计算是挖下一方石块算作一方挖方，填入山沟一方算作一方填方。这样一挖一填便算作两方石方，事实上是一道工序，因此工效较高，进度较快。这对犯人大有好处，队长、指导员、干事等督工较松，犯人劳动不致过于紧张，对饿着肚子的犯人可说是天大的隆恩。

但是同时却发生了一桩苦事，犯人每天在布满边角锐利的石块上挑担走动，鞋底磨损

极快，一双新鞋穿不到一星期，鞋底便磨破。我的鞋本来就不行，挑担穿了几天更破了，于是脚底磨破。犯人中磨破脚底的人愈来愈多，挑担和推小车运石块的工效愈来愈低。队部向上级反映，上级便向附近老乡定做布鞋，做好后每人发给一双。可是布鞋底更不耐磨，几天就磨穿，于是犯人们各自想办法来修补。有人用铅丝扎上旧鞋底，有人把破布缝在袜子上，有人把木片铅皮垫在鞋底的破洞上，五花八门各出心裁。有一个聪明犯人想出一个好办法，把鞋底上涂上热柏油，然后在小碎石和沙子上踩。使它们嵌入柏油中，冷却后变得坚硬耐磨，这办法既方便又有效，一双鞋可多穿好多天。从此以后，每逢发下新布鞋大家都照办。好在工地上到处都有柏油，而且涂鞋底所用极有限，下脚废料已足够用了。

犯人们这一顾虑大为减缓，可是另一问题又日益严重，那就是棉衣棉裤的问题。犯人们的棉衣棉裤已发下近两年，由于长期在劳动中磨擦拉扯，破损得很快，虽经各人不断地修补也无济于事。每人都是披一条挂一块，破破烂烂，形同乞丐。我因经常挑担子，破得更不像样。棉衣两肩破两个洞，棉裤破几个洞，有几处披挂到要掉下碎片，便用麻皮扎在一处，勉强不致散失，好歹能挡一些风。

大概由于犯人的棉衣裤实在太破烂了，队部透露消息要发新棉衣棉裤。队长告诫大家：新棉衣棉裤数量不够，不能每人都发到，因此凡衣裤不太破的人暂时等待一下，让实在不行的人先换，这次发不到的人不久以后再补发，大家要有互让的精神，决不可争吵。这下不要紧，大家暗中把自己的旧棉衣棉裤故意扯烂，以免发不到新的。不敢当众扯，便在厕所中扯或在睡觉时扯。有些人的衣裤本来还可以，也扯得稀烂。大家对于会补发之说没有人真信，因为干部们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屡见不鲜。由于这个原因，再加其他原因，多年来犯人中造成了遇利必争，争必死争的风气。

次日下午收工后中队集合，队长、指导员、干事都来了。院子中放着几大捆黑色棉衣棉裤。犯人们排好队，由干部们点名观察，按旧衣裤破烂程度排次序发衣裤。发到最后还剩十余人时已发完，队长对没有发到的人说以后会补发。这十余人除现有的一套外，可以在被换下的旧衣裤中另选一套作为修补旧衣裤的材料，这一办法稍稍平息了发不到的人的

不满。作为一个犯人是没有发言权的，更不敢表示抗议，只有忍气吞声，自认晦气。

我的旧衣裤因平时不事修补，属于最破烂的，所以先发到了。事后，我把发棉衣裤的先后情况向队部写了一份报告，并提出一项建议，内容是：“这次发棉衣棉裤，按破烂的程度来发，谁的衣裤越破烂越优先发到，谁的衣裤越完整越发不到，造成了犯人们唯恐自己的衣裤不够破烂，发不到新的，于是在暗中故意扯破自己的衣裤。由此可见这办法不好，但已是既成事实，不能挽回。我建议队部向大家宣布：下次发新衣裤，无论是棉的或单的，按完整程度的次序发，一律先发给对衣裤爱护好的人。谁的旧衣裤越完整越优先发给新的，对衣裤破烂的人最后发。对发不到的人，发给换下来的旧衣裤。队部可备针线剪刀、棉花和碎布，谁要修补衣裤可随时领用。”

这个建议得到干部们的同意，并召集大会把这项办法宣布，犯人们对此也表示欢迎。从此以后，犯人们及时修补衣裤，保护得很好，不像以前那样褴褛，情况大为好转。干部们称赞我说：“到底是大学生有头脑，想得出好办法。”

自投入劳改以来，“大学生”一直是个贬义词，是被耻笑的对象，唯独这一次含有褒义。不久队部又提升我为小组的学习组长和队部的通讯员，可说是因功受奖。

通讯员的任务是办理犯人的信件、汇款和邮包，传达队部的命令或通知，替干部作报表和抄写文件等杂务，事务并不繁重。这样一来我在工地上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体力的消耗减低了，同时也不再受龙头犯人的欺压，因为我和干部们接近，他们对我有了顾忌。可是生活中添了很多琐事，不如以前那样简单平静。有人很羡慕我，认为我劳动既轻又有博得干部们好感的时机，对争取减刑有利。可是按我的个性，不喜欢干必须负责的事情，更不愿与政府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只是对干部的工作分配不能违抗。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中有一条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干这项工作实在是勉为其难，并非甘心情愿。我的一项建议，原来只是为犯人着想，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想不到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评定劳动等级

来到“55公里”后，也记不清过了多久，因受粮食定量的影响，犯人中病号日益增多，较重病号照例调去病号队。中队的人数一天天减少，工程进度逐渐低落。有一天晚间，队部召集小组长去开会，回来后向大家传达了一件出奇的事：队部命令所有犯人都要评定劳动等级，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评定的办法采用自报公议，由队部核准。目的是什么？没有宣布，这下引起了大家的疑虑。有人以为有重劳动的任务，须体力强的人去干；有人以为是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人，调去干轻活儿；有人以为要按体力强弱重新编队重新分配工作。我猜不出是什么原因，但深信肯定是与犯人切身利益有重大关系的事情。经验告诉我，事先不宣布的事总是凶多吉少。

当晚进行评定体力等级时，多数人患得患失，摸不清是往高里报好，还是往低里报好，因此默不作声。没有人肯领先自报，出现冷场。我那时已当上了学习组长，须掌握开会，可也不知怎样办。后来我说：“大家不愿先报，由我和劳动组长先报。我报乙等，你呢？”

那劳动组长迟疑了一下说：“我报甲等。”

小组的劳动组长照例是全组体力最强、表现最好的，他报甲等是理所当然。我又问大家：“是自报一个、公议一个，还是全体先自报，然后一起公议？”大家思索了一下，有人主张前一个办法，有人主张后一个办法，也有人不表态。于是我说：“我看还是按小组名单先自报，全体报完后再按名单逐个公议和通过。这样彼此可有个比较，便于衡量，大家认为怎样？”

我这样一说，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置可否，但没有人反对。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提，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除我和劳动组长已自报外，其余的人正要开始报，就寝的钟声响了，当晚的会就此结束。大家劳动了一整天，疲劳之极，巴不得早些睡觉。

第二天晚饭后开学习会，按昨晚的方式继续开劳动等级评定会。先是自报，进行得很快，可是一到公议阶段就发生争执，吵吵嚷嚷，一片混乱。按说报高报低，孰利孰弊，既

未弄清楚，没有争吵的必要。但有人不按自己的体力来报，别人总认为是投机取巧，要提出意见，争执由此而起。这样一直闹了两个多小时，只公议通过了小组人数的一半。次日晚又继续进行，又是一直到就寝时间过了很久才全部结束。自报和公议的记录交给了队部。

隔了两天，队部召集开会，大队干部来作报告，大意是：“粮食定量实行以来已经一年多，由于政府政策正确，犯人们遵纪守法，因此没有发生重大偏差和问题。可是仍有少数反改造分子私下发牢骚，散布流言蜚语。现在警告这些人，你们这些泥鳅是掀不起大浪的，如果不安心改造，乱说乱动，必将受到严厉处分。过去一年多大家吃的是稀饭，经过这较长时间的实践，发现这办法不好。第一点，大家吃的数量一样多，是表面上的平均，从而体力强表现好的人由于劳动量大，吃不饱。相反，体力弱表现差的人由于劳动量小，吃得过多。这是实际上的不公平，是不合理的。这次叫大家评定劳动力等级，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平均分饭办法，打破这种平均主义。从今以后，大家要按评定的劳动力等级吃饭，即甲等劳动力的人吃甲等饭，乙等劳动力的人吃乙等饭，丙等劳动力的人吃丙等饭。具体办法是今后改吃干饭，即高粱馍或玉米馍。甲等每人四个，乙等每人三个，丙等每人二个。另有开水每小组两桶，大家分喝，一日三餐都是如此。各小组由小组长开出全组名单，注明各人劳动力等级，并统计出甲等几人，乙等几人，丙等几人，交队部和伙房。开饭时伙房按名单上的统计数字，把馍分发给各小组，然后由小组长按各人的等级分发给各人。如有人不守纪律，争吵或捣乱，立即报告队部，从严处理。”

干部的报告完毕后，犯人中起了一阵骚动。评定劳动等级原来是为了分等级吃饭，实在是意料不到的事，种种猜测没有一个猜中。粮食定量已是空前未有，按体力分等级吃饭更是闻所未闻。这项办法对体力强的人可说是照顾，对体力差的人是虐待。第二天按劳动等级吃饭的办法就开始执行。开早饭时各小组的小组长去伙房领饭，伙房按各小组名单的数目把玉米馍发给各小组。那馍约有鹅蛋大，从底的中部到中心是空的，这是为看起来大一些，同时容易蒸熟。小组长领回馍后按各人的等级分发给各人，然后由小组值日去伙房挑回两桶开水，每人可分到一杯，不能多喝。因当地没有水源，须用卡车去远处运来，猜

想这也许是不吃稀饭、改吃干饭的原因之一。在饮水都不够的情况下，每天早晨一个小组发给两脸盆冷水洗脸外，其他用途概不供应。犯人们个个肮脏不堪，工棚内臭气熏人。这种状态一直到天暖开冻，山脚下小溪中冒出细流后才缓和。

此后一日三餐都按此办法执行。我属乙等劳动力吃乙等饭，比以前无大出入。吃甲等饭的人当然比以前好过些，最难熬的是吃丙等饭的人，两个空心馍几口便下肚了，连半饱都谈不上。有些人劳动力虽差，可是饭量并不小，劳动力和饭量并非一定成正比。这办法执行几个月之后，有的人明显不能支持，不但外形消瘦，精神也日益萎缩，连走路也摇摇晃晃走不稳。病倒的人越来越多，逐渐调到病号队去了。有些人还来不及调走就死在工棚，那凄惨的情景至今还在我脑海中萦回。

39 公里

春去夏来，下过几场雨之后，山脚下小溪中的水流量增大，溪旁也生出了许多不知名的野花和野草。犯人在溪流中挖了好几个深坑，积蓄溪水，用以洗衣、擦身、洗脚，每人都感到无比舒适。溪水清冽可饮，也解除了长期口渴得不到畅饮的苦恼。

此时“55公里”的工程已接近尾声。由于犯人的驻地是在山坡的平地上，原定要在此建车站，所以大部犯人须转移到新工地，剩下的扫尾任务留给一小部分犯人去完成。

新工地离包头39公里，那地段荒无人烟，也是没有名称，于是也以“39公里”当作该地段的地名。犯人仍住A字工棚，设在一片平地上。我们到时干线路基已填好，要进行的任务是填一条约两公里长的岔道路基。这里与“55公里”相反，完全是土方工程，一点石方也没有，可是劳动强度反而大。原因是路基高出地面，挑土时需要爬坡，挑担子上坡是最吃力的劳动。我初到时还好，日子一久，难以支持。

在这一工段时，我结识了一个犯名叫徐东海，与我是同一中队不同小组。解放前，他在上海一家银行中任职，有如同乡，收工后碰见时，彼此常谈些上海市的景物风情。他年

铃比我略小，体格很魁梧，吃甲等饭。后来有人打小报告给队部，说他劳动不卖力，装筐装得少，挑担跑得慢，中队长于是把他降为吃乙等饭。他个头大，饭量也大，吃乙等饭实在饿得不行，恳求中队长恢复他吃甲等饭，并向中队长保证一定努力劳动。中队长对他说：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如果表现好，就可考虑恢复吃甲等饭。”

他听了很高兴，于是拼命地干，见到我时也乐呵呵地说：

“我恢复吃甲等饭已经有希望了。”

他的工地离我的工地不远，平时在工地上劳动时彼此可以看得见的。可是不久以后，我接连两三天没有看见他，一问他小组中别的犯人才知道，他已死了。我大吃一惊，几天前还好好的，挑担跑得很快，怎么一下子死了，我想可能是遇到了意外事故。

收工后，我去医务所问犯人医生。他告诉我，徐东海由于劳动过度，在工地上心脏病发作，抬到工棚便死了。

我听了很难过，茫然若失。他这人善良直爽，也是知识分子，是我在劳改队中能谈得来的少数几人之一，他死了我少了一个难友。继而一想，像他那样个头，吃那么一点点粮食，与其经常在饥饿中煎熬，倒不如一死，而且因心脏病暴死，还是死得爽快的。如果因身体日亏，抵抗力日差，引起其他疾病，又得不到适当的医疗而拖死，苦头恐怕要大得多。徐东海的死使我十分悲哀，同时想到，在这样的处境下，我自己的结局还不知是怎么样。

在这里填路基是从路基两侧各 50 公尺以外的土地上取土，取土时从地面下挖至两公尺深，然后向外扩展。土是干土带沙质，松软好挖。只是土里小树根很多，挖时较为费事。按路基质量要求，这些挖出的小树根必须检出，不能掺在土中填入路基。因此取土坑中满地是检出丢掉的小树根，粗的如手指，细的如筷子。起先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树的根，也没有人在意。有一天，犯人中有人发觉这些小树根是甘草，味甜可吃。一下传开了，很多人拿来嚼着吃，有人拿来泡水喝，几乎人人都收藏了一些，在晚间学习时吃。我也不例外，收集了一些洗净切断，随时含上一段，好似吃水果糖。犯人除三餐外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三餐也吃不饱，因此吃这带甜香味的甘草觉得很有味。

不幸的事约一星期后发生了，有人脸部肿胀，有人四肢肿胀，有人生殖器肿胀。我吃得较少，只是手指和脚趾肿胀，可是也很不好受。事情发生后，据犯人医生讲，甘草须焙烤后才能入药服用，吃新鲜甘草就会犯肿胀的毛病。于是，队部乘犯人出工的时候把工棚内大家收藏的甘草全部搜去，并和附近市镇上的中草药行联系，派卡车来把工地上遍地的甘草根一扫而光全部运走了，并下令不许再吃。对于肿胀，队长、指导员们认为是犯人自作自受，不予治疗。事实上这也并不是重病，几天便好了。这一插曲本是无关紧要的事，只是说明犯人饥不择食的可悲景况，和粮食定量赋予劳改犯人苦难的深重。

来到“39公里”几个月后，有一天忽然调来了一批新犯人，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事，原因住所、粮食、饮水、燃料等等都要超出预算。好在这次调来的人数不多，便分散安插在各中队各小组中。我的小组中调进了一人，据他说是从苏北农场调来的，我一听便引起了注意。据他说上年夏季苏北农场遭到台风袭击，海潮淹没了农场，棉田、水渠、房屋和一切设备全部被毁。于是当局把犯人陆续调走，其中一部分便调来“39公里”。他既是来自苏北农场，当然知道以前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一案，于是我便与他交谈。我问他：

“大前年苏北农场发生的暴动集团一案结案了没有？”

“你们调走后约半年就结案了。”

“结果怎样？”

“镇压了七八人，判刑的就多了，记不清了。”

“有一个姓费的是镇压了，还是判刑？”

“姓费的，是不是一个大学生，小个子？”

“对，就是他，他是我的老乡。”

“听说他是首要分子，当然是被镇压了，宣布名单时有他在内。”他说。

这情况早在我意料之中，他如不被镇压，那倒是意料之外。当局在处理这类性质的案件时决不会心慈手软，否则在镇反、肃反中也不至于杀死那么多的人，造成那么多的冤假错案。费某可能也料到自己必死无疑，不相信“争取宽大处理”那一套，从而不诬陷无辜，

不拖人下水，否则我有可能被牵连进去，那就有口难辩无从解脱了。为这事我背过很久的思想包袱，现在知道此案已结，我的顾虑可彻底消除，感到十分松快。

同时另一感想又袭入我脑海中，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不安全感，也可说是恐怖感，无时无刻都在困扰着所有人，只有领导阶层或政治投机分子可能是例外。即使是胆小怕事、非常谨慎小心的人也难免有祸从天降的厄运。说“错”一句话，写“错”一封信，交“错”一个朋友，都可导致入狱甚至丧命。这所谓暴动集团一案的结案，虽消除了我被卷入的顾虑，可是镇压了那么多人，又使我心情沉重。对于费某被处死，我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也使我感到作为一个在中共政权下的政治犯的处境是太可怕了。

吊人沟

“39公里”的工程比较简单，量也不大，进行几个月便完成了。随后我们这批犯人被调到包兰铁路离包头约一百多公里处的“西山咀”。去时一段较长的路是乘卡车的，一段较短的路约50公里是步行的，不过行李还是由卡车运送。早上天一亮就出发，步行到中午，休息一小时并吃午饭，又开始步行，到下午五时左右到达目的地，几乎走了一整天。犯人们大多数穿着破鞋，不少人脚上磨出了血泡，我也是其中之一。

到达之后，重新编队、分配工棚，这是每次调动后的例行公事。我编入的小组中有几个蒙族人，年龄都在中年，其中一人的铺位紧挨着我的铺位。那人很健壮，没有文化，奇脏无比，贴身穿着羊皮袄和羊皮裤，没有内衣裤，颜色已变成灰黑色，而且很硬，由于汗渍，膻臭不堪。睡觉时，我因怕闻臭味只好背着他睡，很不舒服。他虽是个大老粗，却很通情达理，并不蛮横，而且性格直爽，普通话也说得流利。我与他交谈，常问他关于蒙族的风俗人情，有些是我从未听说的新鲜事，增长了不少见识。这些蒙族人体力很好，但很任性。从他们的谈话中透露出对政府、对共产党的不满，有时还大声地发牢骚。这些话好像并没有传到队部，没有引起是非。也可能因为当地属内蒙，干部们对蒙族犯人另眼相看。

西山咀是包头、银川之间好像是叫大青山的一条大山沟的出入口处。那山沟名为吊人沟，蜿蜒曲折，峭壁对峙，草深林茂，巨石如兽。沟底激流在乱石中穿行，并汇成无数清潭。两旁有多种不知名的野花，其中有一种形如宫灯，精巧绝伦。这条山沟风景优美，远胜杭州的九溪十八涧和北京香山的樱桃沟。可地处荒漠，人烟稀少，不能成为出名的旅游胜地。我们这批劳改犯在苦难深重之中，也没有那份闲情逸志去欣赏这大好美景。据说这吊人沟纵深达百余公里，岔道很多，有多处出入口，历来是土匪隐藏出没之处，官兵难以追剿。“吊人”二字是当地土话害人之意，因此名之为吊人沟。

我们在此地的劳动任务与以往不同，不是填路基或其他建设工程，而是把山沟中无数的小石块收集起来，用钢锤打成直径五公分左右的道渣，作为铺铁轨枕木垫底之用。以前多用腿力劳动，现在转变为多用臂力，相比之下，体力消耗略有减少。但是由于队部强制要完成定额，体力较差的人不得不动自动延长劳动时间。我的体力属中等，完成定额还不太困难，可是稍一松懈也不能按时完成，不得不加班加点。队部制定定额照例是宁高勿低，务使犯人尽力而为，不遗余力。这还恐不够，还经常举行劳动竞赛，掀起挑应战。按干部们的话说，“劳动就得像劳动的样子，不能死气沉沉，必须生气勃勃，热火朝天”，这种场面是以榨取劳改犯的体力为代价的。我作为小组的学习组长，不得不起带头作用来响应政府的号召，但心中充满了矛盾和苦闷。

初到此地时是春末夏初，过了一个多月进入盛夏。当地是沙质平原，烈日照耀下反射强烈，中午时分热不可当，穿着胶底鞋走在沙土地上感到烫脚。幸亏我们是在山沟中劳动，上有悬崖密林，下有流泉芳草，非但不热，还感清凉，遇阴天或刮风还感到有些冷。犯人们大多只有单衣裤和棉衣裤，没有其他衣着。即在夏天出工时也总是带着棉衣，在敲打石块时把棉衣作坐垫，否则一整天坐在石头或小板凳上屁股要痛。这样的劳动情况除吃不饱外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每天不至于极度疲劳。

可是好景不长，一场灾难又从天降，全大队发生了流感，据说是全球性的。在社会上这种病并不可怕，因为有药，能得到适当的治疗。但在劳改队中得了这种病却是很大的威

肋。犯医既少，药品又缺，患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只有硬挺，如获得病假已是天大的隆恩。我小组开始时有两三人得病，因为无法隔离，容易传染。一星期后增至六七人，不几天又增至十余人，超过小组人数之半。这时我也被传染，并且发展成副伤寒，每次高烧入昏迷状态。犯医也给了一些药吃，可是没有起色。给什么药也不得而知，因为打听是什么药是犯忌的，犯医也决不会告诉你，其中奥妙鲜为人知。我昏睡了不知多少天，也是命不该绝，渐渐地烧退清醒，又过了几天体温恢复正常，一场本可致命的病就算挺了过去。病后身体衰弱，骨瘦如柴，头发脱落了很多。我虽体力不济，可体力劳动是劳改犯的基本任务，决不允许避免，于是不得不在病后再次投入力所不能及的繁重劳动。我这场病因好得较快，没有被送到病号队。可是那次流感发生后，有不少犯人因病情较重送去病号队，从此未见他们回来，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西山咀打石块作道渣的任务在春节前几天完成了。犯人们不再出工，只是在住地范围内打扫卫生，做过春节的准备。此时队部宣布：

“春节一过，在此的犯人就要调动。一部分原来户口在西部地区的犯人要调到离此地不远的西山农场。一部分原来户口在东部地区的犯人要调到内蒙的保安沼农场。以后你们将从工业转到农业。到了农场所有主副食如粮食、蔬菜和肉类都是自给自足，你们就不愁吃不饱了。乘这几天休息，个人把自己的衣着整理一下，该洗的洗，该补就补，过不了几天就要出发。”

对犯人来讲，能吃饱是最好的消息，但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话不很相信，因此也感觉不到有多大高兴。譬如在调来西部之前，干部们也曾说过：“西部地区盛产牛羊肉，蔬菜却想吃也恐怕吃不到了。”当时犯人们的副食全是蔬菜，体内缺乏脂肪，对肉类向往已久，听到西部有牛羊肉吃，十分高兴。可是到了西部，非但牛羊肉没有吃到，连蔬菜也几乎吃不上。但不管怎样，能有调动总是好的。猜想情况总不至于比当时当地更糟，总会好些吧。再说反正犯人任凭摆布，没有自己选择的可能。■

【资料】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前 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把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的落花流水。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命，要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就是要大破大灭资产阶级，大立大兴无产阶级，让伟大的毛泽东主义光辉照亮整个首都，整个中国，整个世界。我们是用伟大的毛泽东主义武装起来的，最有战斗力的队伍，我们是“四旧”的死对头，我们是旧世界的破坏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们要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向“四旧”猛烈开火，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东西，把一切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东西彻底砸烂，我们要清算资本主义的一切不合理制度，我们要让伟大的毛泽东主义普照全世界，我们要让我们伟大的祖国革命化，战斗化，毛泽东主义化，让一个崭新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上。

破旧立新一百例

- 1、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 2、公园里要多设立主席语录，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应把宣传毛泽东主义，读《毛主席语录》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

- 3、出版事业管理局要绝大多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在新华书店大量出售，让毛泽东主义的光辉照射到全国各个角落。
- 4、印刷社大量出版主席语录，并在各书店出售，做到全国人手一册。
- 5、《毛主席语录》要人手一册，随身携带，时时学习，事事照办。
- 6、美术出版社要印刷大批主席现成语录，尤其逢年过节，要大量出售语录和革命对联，满足人民需要。
- 7、现有自行车、三轮车，要挂主席语录牌，汽车、火车要画主席像和漆上毛主席语录。
- 8、有关部门，要大量制作自行车、三轮车上的语录牌，满足人民的需要。
- 9、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等出厂新产品一律带上语录牌，必须增加这一道工序，必不可少。
- 10、街道工作必须突出毛泽东主义，成立毛著学习小组，使家庭妇女革命化。
- 11、各校、各单位必须成立最高指示宣传队，使每个人随时能听到主席的谆谆教导。
- 12、各公园、各主要街道要成立广播站，由红卫兵之类组织负责，宣传毛泽东主义，国际、国内时事。
- 13、旧国歌一定要由工农兵改成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内容，铲除田汉的这株大毒草。
- 14、街道居民委员会要成立几个报栏，使每人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
- 15、今后各报纸，要突出毛泽东主义。社论少而精，要多登工农兵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好文章。
- 16、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如猫、狗，美术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
- 17、队员过队日，团员过团日，一律不许逛公园，要加强阶级教育和毛泽东主义教育。
- 18、以后国庆节，每人都要带主席语录和花束，花束排成标语。
- 19、商店橱窗不能被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水香精所统治，要布置朴素大方，突出毛泽东主义。
- 20、影剧院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放影前必须播主席语录，不让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

舞台，把那些不必要的流氓镜头除去，影剧院票价必须降低，为工农兵服务。

21、文艺工作者，要大力塑造工农兵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英雄形象，作品要贯穿着一条毛泽东主义的红线。

22、各专业文艺队伍，要逐步改成像“乌兰牧骑”，“海上文化工作队”之类毛泽东主义宣传队，要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非常毛泽东主义化。

23、我国建国已经十七年了，但是，那些解放前喝人民鲜血的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老王八蛋们，仍然拿着定息股息过寄生虫生活。我们警告你们，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只许老实改造你们的混蛋思想，不许你们剥削人民。

24、解放后还骑在人民头上、喝人民鲜血的房产主们，我们命令你们，你们这些王八蛋们赶快把私房全部交给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绝不许可你们这些吸血鬼存在。

25、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准私营存在，我们建议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营字样都改成国营，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

26、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绝不允许任何流氓、阿飞存在，我们命令你们马上剪断牛仔裤，剃去阿飞头，脱去火箭鞋，退出黑组织。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是在解放前你们所盘踞的大世界。警告你们，不许你们胡作非为，不然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27、一切服务行业不许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服装店坚决不许做瘦腿裤、港式服装、怪衣裙、怪服装，一切服务行业的革命同志要严格遵守。

28、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

29、照相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以及各种怪像，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

30、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

31、信托商店不许卖估衣、西服等杂七杂八的资产阶级喜闻乐见的东西。

32、洗衣店必须停止给那些资产阶级太太、小姐少爷洗裤衩、袜子、手绢，彻底打碎他们

的妖气。不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应大长无产阶级锐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

33、浴池一律停止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服务，不给他们搓澡、捏脚、捶背，不让他们再压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

34、古书店必须马上停止营业，小人书店要立即销毁一切黄色小人书。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清除一切毒草，不让这些东西再向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35、一切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人物不许收藏黄色书籍、黄色唱片，如有违者，已经清查出来，按企图复辟的罪名对待，进行销毁。

36、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

37、一律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雇佣保姆，谁胆敢违抗，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要严加惩办。

38、一切服务行业必须面向工农兵，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带阶级性。决不生产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切东西。

39、各医院要面向工农兵，必须改革原先的旧制度，取消挂号制度。

40、自己做小玩意欺骗儿童，变相毒害儿童的小贩们，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如有违者，毫不客气。另外命令玩具商店，马上停止出售小手表之类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玩具。

41、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用不着物质刺激。

42、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如不是亲生子不许虐待，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

43、一律不许养蝻蝻、斗蝻蝻，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如有违者，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44、拿着高薪的资产阶级的老王八蛋们，你们听着，解放前你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现在你们仍旧拿着比工人高几倍甚至高十几倍的高薪。你们这是喝人民的血，你们有罪。

从9月份起令你们把高薪降低于人民的水平，银行有存款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

不许取走一厘一毫。如违此令，自己负责，毫不客气。

45、不许资产阶级混蛋随便逛东逛西、逛公园。如有买月票以供逛公园、坐汽车为消遣者，一律把月票销毁，不许他们想入非非。

46、除老弱病残者可坐三轮车外，资产阶级王八蛋一律不许坐。如有违者严加处理，三轮车工人要减少，适当安排好工作。

47、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们，出门必须带牛鬼蛇神牌，由群众监督。如有违者，严加处理。

48、一切牛鬼蛇神，黑帮狗仔子们不经群众通过，不许领薪。我们要降老王八蛋们的薪，只给混蛋们活命钱！

49、饭馆再也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王八蛋们吃喝玩乐的地方了。服务员不许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不给他们做山珍海味、办酒席，不许在饭馆划拳，不能为这些王八蛋们服务。

50、工厂里，一律不给地富反坏右分子退休金，取消一切待遇，要监督他们劳动。

51、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免得我们动手。

52、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没有工作者，一律回乡生产。

53、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们，命令你们马上到办事处去登记，到边疆去参加劳动生产！

54、今后凡不服从国家分配者，派出所一律不许给在市内找工作，让他们去边疆。

55、资产阶级老王八蛋们，命令你们赶快把在解放前剥削来的钱交给政府，不许你们这些喝血鬼再任意挥霍。

56、全国各地摔跤场一律解散，到派出所去登记参加劳动，不许你们再毒害人民。

57、命令全国各地靠欺骗人生活的变戏法的，马上停止你们的勾当，去派出所登记！

58、各杂技团、戏剧院的节目一定要改革，要演有意义的，演员一律不许打扮得妖里妖气，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些肮脏的东西。

59、命令那些没参加三轮车社蹬黑车的（即晚上到车站、大街小巷拉旅客、多要钱，本来只有二里，他给你大街小巷窜拉五里，再向你加倍要钱），兔羔子们，马上停止干这种罪

恶勾当，到公安局去自首！

60、把一些不符合实战意义的体育项目适当削减，大力开展国防体育，如游泳、登山、射击等。逐步做到十五岁以上青壮年每人有一套杀敌本领，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消灭来犯敌人。

61、大街小巷修鞋的，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由有关部门组织修鞋社，修鞋价钱必须减少。

62、写信一律不许写“XXX大人收”等，要破除封建一套，提倡新习惯。

63、五类分子、黑帮分子家中的小汽车、电视、摩托车一律没收，电视交居委会给工农兵家属看。

64、各报纸今后一律不许给过多的稿费，堵住这个黑风口。

65、破除家长制，孩子可以给大人提意见。

66、医院住院、急诊，一律不许先收费（五类分子除外），烦琐制度要废除，具体的由医务工作者自己起来革命，打破旧框框、洋框框，一切为人民服务。

67、禁止一切牛鬼蛇神（旧官僚、地主、资本家、坏分子等）在公园及一切地方教武术、教拳，教气功。

68、任何演出或文艺广播、电影立即取消作者、演员、指挥等姓名，堵上个人名利这条路。

69、命令35岁以下者立即戒酒戒烟，绝不能培养这种坏习气。

70、严禁开庸俗玩笑、讲下流话、干下流事，违者严加处理，严禁叫外号、职务等恶习，一律称同志（黑五类除外）。

71、街道积极分子一律由工农成分先进同志担任，不能让资产阶级分子篡夺。

72、邮递员今后一律不管往楼上、大院里送信。楼里自备信箱，大院里找专人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

73、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

74、禁止戴手镯、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

- 75、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废除银行的利息制度，让人们自觉本着节约爱国精神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 76、建议以后凡是批判电影一律不收费，由集体组织看，个人不卖票，凡是黑五类分子不许看。
- 77、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希望工农兵群众支持这一行动。
- 78、除有急事要事外，出租汽车一律不出租，不让资产阶级王八蛋坐。
- 79、有关部门要尽力想方设法在各胡同建立公厕，减少清洁工人的繁重劳动。
- 80、国家要大力发展汽车运输事业，减少平板车工人的繁重劳动。
- 81、春节厂甸今后一律不开，我们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
- 82、今后各大学、中学、专业学校，都要办成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学校。
- 83、我们学生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每年假期要到工厂、农村、军队去锻炼。
- 84、我们坚决要求改革放假制度，在农忙时，放假去农村支援农业生产。
- 85、沙发、躺椅等不能大量生产。
- 86、金笔等一些太贵的用品不要大量生产（出口除外），因为这不是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
- 87、商店一切产品不能叫洋名，要用中国有意义的名。
- 88、号召所有团员摘掉团徽，去掉这株毒草。
- 89、医生开药方，一定要废除用英文字写的洋框框，开什么药要讲清楚，签名要工整。
- 90、我们坚决抗议，不许把“少先队”改成“全民队”，这就没有它的先锋意义了。
- 91、学校要把毛著当成教科书，用毛泽东主义教育青年。
- 92、各学校也要把锻炼身体、参加劳动放在主要地位，加强军事训练。
- 93、学校要废除封建的师生礼节，建立平等师生关系。
- 94、师范大学、师范学校、幼儿师范自今年起要吸收红五类子女入学。

- 95、凡带有封建色彩、资产阶级色彩的名字，主动去派出所改名。
- 96、各个院落内外一律不许修篱笆、修小房，不能助长这种自私自利思想。
- 97、废除公园卖年票的制度，如工农兵需要修养一律由工厂机关发。
- 98、建议国家考虑工人普遍涨工资、资产阶级权威降工资。
- 99、黑帮分子一律根据罪行罚款。
- 100、提倡简化字，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

结束语

《破旧立新一百例》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红卫兵大胆革命、大胆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的高潮中产生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总结了前一段时间关于破四旧、立四新有关各方面的材料。《一百例》分批出版过几次，最后一次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印发给大家。总之，我们红卫兵是造反的，是革命的。我们的最高统帅是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我们的灵魂是伟大的毛泽东主义。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是伟大的领袖，是伟大的导师，是伟大的舵手。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所提出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26中）红卫兵（卫旗）

1966.9.1 可以翻印

【资料】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2月5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天，无限忠于您的湖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满怀革命的豪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在您畅游过的长江之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胜利诞生了！这是您的光焰无际的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您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造的又一丰功伟绩！这是湖北省三千二百万人民全面落实您的最新指示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红旗如林，欢声如潮的盛大节日里，大别山南，洞庭湖北，颗颗红心向太阳，纵情高歌《东方红》。我们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着北京，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长江波涛连天涌，九派水流有源头。毛主席啊，毛主席！回忆武汉的战斗航程，哪一回不是您亲自指引；翻开湖北的革命史册，哪一页不是用您的光辉思想写出的。

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在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拨开迷雾，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写下了光耀日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情地痛斥了陈独秀及其追随者中国赫鲁晓夫的右倾投降主义，天才地提出了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伟大真理，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道路。

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在伟大祖国大跃进的脚步声中，一次又一次亲临武汉，带领我们乘风破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北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您制定

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阔步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天安门上的红灯永远放射着革命的光辉，汹涌澎湃的长江永远奔腾着革命的洪流。

敬爱的毛主席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重大关头，您又来到英雄的江城。敬爱的毛主席啊！在这一天，在满江汽笛的欢呼声中，您步履矫健，检阅了渡江大军，神采奕奕，畅游了万里长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正如您教导我们的那样：“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您这朴素而洪亮的声音，鼓舞我们沿着您开辟的航道，在大风大浪中勇往直前。

“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正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进行了疯狂反扑。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一次又一次地鼓舞我们冲破惊涛骇浪，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多少次我们向您宣誓：“只要中国不变色，献出青春也值得”。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您的光辉思想不能丢，誓死捍卫您的红心不可变！

最敬爱的毛主席啊，是您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艰苦奋斗的时刻，和我们肩并肩地战斗，在那最危急的关头，和我们的心紧贴在一起，跳动在一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解放军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心连心，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解放军格外亲。革命人民永远离不开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正当革命大批判的烈火在长城内外熊熊燃起，革命大联合的热潮在大江南北奔腾呼啸的时刻，您又来到我们身旁。您的每一条最新指示，都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您的每一个战略部署，都给我们指明了继续前进的航向。

敬爱的毛主席啊！回顾战斗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按您的指示办事的结果，都是您的光辉思想哺育的结晶。千胜利，万胜利，一切胜利归功于您！“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写不尽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

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我们决心用战斗的双手，继续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啊！在这欢庆革命委员会诞生的时刻，我们牢记着您的教导：“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向您宣誓：一定以您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为伟大榜样，永远忠于您，永远忠于您的思想，永远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您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您的最新指示，认真宣传您的最新指示，毫不动摇地捍卫您的最新指示。

敬爱的毛主席，您提出的“要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我们一定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发扬革命的好学风，大学大用“老五篇”，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打倒资产阶级“私”字，大立无产阶级“公”字，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大立无产阶级党性，做一个“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遵照您的伟大教导，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等散布的一切流毒。

敬爱的毛主席！您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决心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筑起一道粉碎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的钢铁长城。“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敬爱的毛主席！您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丰收！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我们一定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警惕阶级敌人的明枪暗箭，扫除资产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把全湖北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敬爱的毛主席啊！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以您的思想为光辉旗帜的新时代，您的伟大真理，赢得了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烈赞仰，您的光辉旗帜，在五洲四海高高飘扬。我们站在长江边，胸怀祖国，心念世界，誓做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一道，把帝、修、反等一切牛鬼蛇神扫光！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千遍万遍地敬祝您，最最衷心地敬祝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资料】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2月23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天，无限忠于您的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我们战斗的喜讯：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沐浴着您最新指示的阳光，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大进军中，光荣地诞生了！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节日里，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红色宝书贴胸口，豪情洋溢喜泪流。我们千遍万遍地欢呼，欢呼您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千遍万遍地歌唱，歌唱您革命路线的辉煌战果！我们千遍万遍地赞颂，赞颂您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建的又一丰功伟绩！四千万颗红心迸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四千万颗红心凝结成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您光辉思想哺育成长的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在欢庆胜利的幸福时刻，怎能忘记您率领我们走过的战斗历程！

四十多年前，在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日子里，您怀着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理想来到广东，亲自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育了无数的革命火种，点燃了漫天遍地的燎原烈火，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迅猛异常的农民革命运动。在这里，您写下了雄文四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光芒四射的伟大真理，照亮了革命的胜利前程！

敬爱的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是您关于分清敌友的伟大教导，使我们识破和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坚定不移地走您指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您的光辉思想，像强劲的东风，掀起了广东农业合作化汹涌澎湃的高潮，把那些梦想阻挡历史潮流的跳梁小丑，淹没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洪流之中！毛主席啊，毛主席！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您一次又一次地亲临广东，视察城市和农村，给了我们最亲切的教导，最巨大的鼓舞。我们高举您亲自制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在世界进入了以您的光辉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您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最大的胆略和气魄，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您的一系列伟大教导，使我们认清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认清了最危险的敌人。遵循您的教导，我们把千仇万恨集中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身上，紧跟您《炮打司令部》的进军号令，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总攻击！遵循您的教导，我们识破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真面目，把这个伪装极巧妙、用心极恶毒的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来示众！遵循您的教导，我们乘着“一月革命”的春风，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粉碎了陶铸、赵紫阳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迷梦！

毛主席啊，毛主席！掀开广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史册，哪一步征程不是您亲自指引！哪一个战果不凝结着您的心血！哪一个胜利不闪耀着您伟大思想的光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紧要关头，您及时地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

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命令，派出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亲人解放军，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战斗情谊深。亲人解放军，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对革命组织的一切言行，凡是符合您光辉思想的，他们就赞成，就拥护，就大力支持；凡是不符合您光辉思想的，他们就教育，就批评，就耐心帮助。亲人解放军，用您的光辉思想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最难忘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您亲自批准了《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这是您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我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永远沿着您指引的航道，前进，前进，前进！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四十多年的峥嵘岁月，四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四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四十多年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深懂得了一个伟大真理：跟着您就是胜利，跟着您就是幸福，跟着您就是光明。我们只有一个理想，做一个无限忠于您、绝对忠于您、永远忠于您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只有一个决心：天变地变，绝对忠于您的红心永远不变；山移海移，无限敬仰您的信念坚定不移！我们只有一个使命：让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普照全广东，永远普照全中国，永远普照全世界！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永远忠于您的祖国南方大门的儿女，欢庆胜利，豪情满怀；展望未来，壮志凌云。我们向您庄严宣誓：一定要把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更高更高，一定要把您的最新指示落实得更好更好，一定要把紧跟您伟大战略部署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快，一定要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鼓擂得更响更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一辈子读您的书，一辈子听您的话，一辈子照您的指示办事，一辈子做您的好战士。我们掌权以后，一千条，一万条，学习您的光辉思想是第一条。千件事，万件事，落实您的最新指示是第一大事。我们坚决做到学

习您的最新指示如饥似渴，执行您的最新指示完全彻底，宣传您的最新指示满腔热忱，捍卫您的最新指示赤胆忠心！我们一定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学习您光辉思想的群众运动，大办特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兴特兴您历来倡导的革命学风，把广东所有的城镇、乡村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坚决遵循您“要斗私，批修”的伟大教导，以光辉的“老五篇”为武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大破资产阶级的“私”字，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大树革命的“忠”字，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排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步步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持久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东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念念不忘您关于分清敌友的伟大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牢记祖国南大门面临港澳，是援越抗美、支港抗英的前哨，千倍万倍地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我们一定要高举“拥军爱民”的大旗，更加紧密地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祖国南大门建设成坚不可摧的反帝反修的钢铁长城。我们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支援港九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斗争，用最大的力量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坚决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让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全世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说尽世界上最美最好的语言，说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唱尽世界上最美最好的歌曲，唱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敬仰；写尽世界上最美最好的诗篇，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千言万语一句话，千歌万曲一个音：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编读往来】

1. 本刊感谢胡鹏池、唐少杰的纠错指谬，为156期封面的误植道歉

承蒙胡鹏池、唐少杰等友人来信指出，《记忆》第156期封面的照片不是迟群（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1968年7月随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而是原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本刊封面设计者轻信互联网，主编又疏于审核，铸成如此大错。《记忆》编辑部向读者郑重道歉。

谨此提醒各位同仁，在使用互联网上的照片时，要慎之又慎，以免像本刊一样，以讹传讹，误导读者。

2. 赵惠中对154期《北师大文革大事记》的修改意见

6月20日，师大数一(2)的高树奎等十七位同学在北饭厅贴出题为《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物理系64级的赵惠中、李庆林、武世文等五位（改为：李庆林、赵惠中、武世文等五位）同学贴出支持高树奎的大字报。……中午，中文系（加：64级）2班的王颂平等同学贴出题为《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晚上，新市委指示，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校方随即大抓“反革命”。贴大字报的师生被批判斗争，整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并被限制人身自由。赵惠中等五人（改为：李庆林等三人。说明：1. 大字报上署名程序：李庆林、赵惠中、武世文、XXX、XXX；2. 另两位同学因“出身”较高而检查了，没被打成反革命）被打成“现反”，受到多次批斗。

8月14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专揪5·16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工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这条时间不对：当时尚无“师大井冈山”存在）

8月18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七十六个革命组

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与黑匪兵团决一死战，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司令部。{这条时间不对：当时尚无“师大井冈山”存在}

8月20日，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归案，师大井冈山揪出陈立。{这条时间不对：当时尚无“师大井冈山”存在}

8月21日，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批斗余秋里誓师大会，并成立了“揪余火线指挥部”。{这条时间不对：当时尚无“师大井冈山”存在}

8月23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成立，仅一百多人，物理系（应为：中文系）的郑云云任团长，谭厚兰任政委。多数派在此前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师”，人数达千人。9月18日—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连续四次召开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的代表蒯大富、王大宾等人参加座谈。一致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周恩来是“搞调和”……张春桥把发言印成材料，由江青上送毛泽东。为即将升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做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这条请核实，当时好像无人说周恩来搞调和）

11月初，北大王复兴到北师大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应改为：“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兵团”是“造反兵团”的简称）串联。

12月19日 外语系的董连猛把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应为：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亭、敦进田）四人揪到外语系批斗，随后将其押送专政机关。■

3. 不平答越人

看到155期上越人先生对笔者《四大马屁》的“不同意见”，甚为感谢，尤其是提供了很多参考文献，甚有帮助。对于笔者来说，当然会尽量地找这些文献，如果由于条件所限，确有困难，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说是不同意见，其实也就是批评。越人先生对笔者的批评，笔者是欢迎的，而且希望

有更多的人来批评，通过争论，才能挖掘出真相。虽然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至今也不甚了了，但对马克思说的“历史的真相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倒是坚信不疑。笔者的态度是对者接受，错者反批。如果笔者认为有些意见不妥当，那就进行反批，想来越人先生也是欢迎的。

越人先生承认“林彪的拍马屁无疑是他个人历史的污点”，这也是很多人的共识，当然也有人否认的。但是，有趣的是，一些人尽管承认其为“污点”，却不肯加以分析，加以批判。于是，这“污点”就成了微风一起就不见了纱巾帽。笔者写此文的动机，就因为很多人知其为“污点”，却不知其“污”在何处，故而需要加以评析。如果评析没有点到要害，或者不够全面，这才是笔者需要提高的。

越人先生说：“且对于相关史料的解读最好能够全面一些，这样也可以有效避免国内党史研究著作中选择性运用史料带来的种种陷阱。”这话也说得有点道理，只是也不够全面。说段故事吧。故事出于《鹿鼎记》。

康熙问兵部尚书明珠：“明珠，此事是兵部该管，你以为如何？”明珠道：“圣上天纵聪明，高瞻远瞩，见事比臣子们高上百倍。奴才想来想去，撤藩有撤的好处，不撤也有不撤的好处，心中好生委决不下，接连几天睡不着觉。后来忽然想到一件事，登时放心，昨晚就睡得着了。原来奴才心想，皇上思虑周详，算无遗策，满朝奴才们所想到的事情，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料中。奴才们想到的计策，再高也高不过皇上的指点。奴才只须听皇上的吩咐办事，皇上怎么说，奴才们就死心塌地、勇往直前的去办，最后定然大吉大利，万事如意。”韦小宝一听，佩服之极，暗想：“满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谁也及不上这个家伙。此人马屁功夫十分到家，老子得拜他为师才是。这家伙日后飞黄腾达，功名富贵不可限量。”康熙微微一笑，说道：“我是叫你想主意，可不是来听你说歌功颂德的言语。”明珠磕头道：“圣上明鉴：奴才这不是歌功颂德，的的确确是实情。自从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稳的讯息，奴才日夜担心，思索如何应付，万一要用兵，又如何调兵遣将，方有必胜之道，总是要让主子不操半点心才是。可是想来想去，实在主子太圣明，而奴才们太脓包，

我们苦思焦虑而得的方策，万万不及皇上随随便便的出个主意。圣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自然不是奴才这种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因此奴才心想，只要皇上吩咐下来，就必定是好的。就算奴才们一时不明白，只要用心干去，到后来终于会恍然大悟的。”

众大臣听了，心中都暗暗骂他无耻，当众谄谀，无所不用其极，但也只得随声附和。

众大臣听了，“也只得随声附和”，在诛之讨之的年代里，也能如此。但是，如果情势变了，也不能“骂他无耻，当众谄谀，无所不用其极”，必须先去“对于相关史料的解读最好能够全面一些”，还要考虑到“有效避免国内党史研究著作中选择性运用史料带来的种种陷阱。”这世界还成为世界吗？你看到一个人无耻，你就说他无耻，就像你看到一个人丑陋，你就说他丑陋。当然，能够多看看别人的想法是有益处的，可以提高你的审美观，但是它不是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你有一颗纯真的心。就像一个小孩子说“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如果没有这样的孩子，这个世界就完啦。说实话，我倒是看到有很多人，对于相关史料的掌握不可谓不全面，这些资料，在他们手中，就像调色板上的颜料一样，专门用来把丑女打扮成天使，把无耻吹捧成高尚。

下面再来说说越人先生和笔者的不同意见。越人先生说：“关于庐山会议，不平兄说林彪讲的‘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是为批彭定了调子，这种说法有合理之处，但并不全面。”这里想纠正一下，越人先生说“不平兄说”，其实却并非笔者所说。查《记忆》上笔者的文章，原文如下：

在披露了林彪的这些讲话后，李锐先生还有下面文字：

关于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这是林彪在常委会上定的调子。

后面也说到：

4日晚上，听到常委传达尤其是林彪的讲话之后，当然更深入到“实质性”的问题：“武文合璧”，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要按照“右倾机会主义”的面貌改造党；彭德怀这个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历史上一贯犯错误，同毛主席三七开，这次要算历史总账。

黄克诚在《黄克诚自述》一书中作相似的回忆：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越人先生对相关史料的确掌握相当全面，对李锐先生的《庐山会议实录》不说是倒背如流，也应该是熟读精阅了，居然对李锐先生如此为人熟知的语录不知道，还要把它归功于笔者，实在有点让笔者汗颜。越人先生是不是应该说：“关于庐山会议，李锐先生和黄克诚先生说林彪讲的‘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是为批彭定了调子，这种说法有合理之处，但并不全面。”笔者也不想多发挥了，就算是越人先生粗心把。

越人先生说：“庐山批彭，有一个重要的定性在林讲话中并没有表达出来，那就是毛后来提出的‘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还广征博引。此话是有道理的。最重要的证据是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其中就说到：“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而且，彭德怀的定性还不止这两条，还有使彭德怀大光其火的“军事俱乐部”，还有导致了八万言书的“里通外国”。但是，问题是，笔者文章的主旨并不是全面地分析庐山会议，也不是全面地分析彭德怀的定性。笔者文章的标题《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已经指出了这一点。笔者只是想剖析林彪的拍马屁。故而，越人先生如果与笔者有不同意见，最好是针对笔者的文章：或者说林彪没有拍，或者说林彪拍的不是马屁，或者说林彪拍的庐山屁不好。某甲说：“这个女孩身材不错。”某乙说：“我和你有不同意见，你的说法不够全面，这个女孩的脸蛋也不错。”这都是哪跟哪呀。这最多只能算是补充。

以上就算是答复吧。回首一看，笔者自感不够厚道。越人先生称笔者为“兄”，笔者却抡枪使棒，言词尖刻。只是，言词尖刻，针对的是观点，倒并非对越人先生本人有何成见，而且希望越人先生能够从这些言词中领悟到一些东西，况且，有些言语也并非是针对越人先生，而是针对社会现象。笔者很欣赏越人先生能够坦诚而谈，也能体会到先生的好

意。总之，如果越人先生感觉上有冒犯之处，请原谅则个。

文章的第一部分在《记忆》发表以后，又作了些修改，发在不平abcd的博客。最大的修改是关于会理会议，自感还没有人讲得如此透彻。越人先生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往观看。

如果说，笔者的文章能够给越人先生一点刺激，刺激他也去对林彪的经典马屁逐一点评，则不管观点如何，笔者都会感到欣慰。欢迎越人先生继续讨论。■

4. 越人答不平

看完不平兄的反馈，也就相关问题再说几句。

不平兄所言“有很多人，对于相关史料的掌握不可谓不全面，这些资料，在他们手中，就像调色板上的颜料一样，专门用来把丑女打扮成天使，把无耻吹捧成高尚。”笔者深有同感。以往史学研究中确实存在某种黑白分明的历史学叙述，白方的问题顶多是好心办坏事的失误或迫不得已才做了些违心的事。而与之有关的记载也往往是语焉不详。而有些人，至于被选定的黑方，自然是罪恶滔天。以林彪为例，自从由第二号神变为第一号鬼之后，他的许多真实或虚假的污点便广为人知甚至被大肆渲染。对于这些污点怎么看，如何分析，笔者基本赞成不平兄反馈中关于批判林污点的论述。有污点自当秉笔直书，该批判的自然不应为尊者讳，而颠倒黑白的为之辩护更是等而下之。但在批判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把那些与污点相关的历史活动搞清楚，这样重建相关史实时才能更准确，对于历史人物也更公道。说到评价历史人物，个人很喜欢这样一段话，“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过；敬之不增其功，厌之不益其恶”，望与不平兄共勉。

前面是个人的一些感慨，若是有冒犯到不平兄，还请见谅。再来谈谈和庐山会议相关的某些史实，前文就所谓“彭高联盟”发表的意见，不平兄以为有理，但认为和他讨论的“马屁”无关，个人对此有些不同意见。庐山对彭如何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不平兄所言林彪此次“拍马屁”的成效。笔者以为，林彪此次庐山的表现，站在毛的立场上，可说是既好又不好。先说不好的一面，借用毛文革前夕评价姚文元文章的那句名言，林的批

判定性是“没有打中要害”。为何没有打中要害，关键是因为林的批判基本上是旧瓶陈酒，缺乏足够的“创新性”。不平兄引李锐、黄克诚文中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的说法，林彪对此基本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大都是照搬当年延安华北座谈会上对彭攻击指控言论的山寨化版本而已。正如散木先生的研究论文所指出的，“从后来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来看，许多内容早在华北座谈会上已经提出了，比如关于‘彭得华’的名字、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执行‘立三路线’、诛杀王佐和袁文才、虚伪的生活朴素（所谓在生活上学冯玉祥）、一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闹独立性等等，这些明显是不公正的指责，到了庐山会议上又重新被提了出来。”（散木：《彭德怀与华北座谈会》，《文史精华》2004年第5期）。还应看到的是，翻华北会议的旧账批判彭德怀，是当时不少人在庐山会议上批彭时选择的作法。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就谈到，“我发言之前，曾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交换过意见，虽然觉得彭德怀同志的信没有错，但又不能不批，于是我们在批判发言中尽量避开这封信，而主要谈过去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已批评过的几个历史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69页）。至于是那几个历史问题，薄的回忆就避而不谈，只是含糊其词的称之为“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过头的话，”（同上）。而我们今天知道，华北座谈会的批评指控对彭伤害很大，重提这些旧账，无疑又一次伤害了彭。因此，就翻旧账批彭而言，林、薄、杨、安等人都可说是难辞其咎。而基于林在党内的地位，其批彭产生的影响，林在这方面要承担的罪责自然也高于薄等人。但就毛此次在庐山要批倒批臭彭的目的而言，只翻旧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在如何创新批彭方面，林之外的不少人贡献甚大，“有人”揭发彭的“里通外国”问题，“有人”揭发彭在高岗出事前后的“异常”表现（根据某种编纂规则，涉及正面人物的错误一般会用有人，XX，XXX来代替，所以李锐先生的《庐山会议实录》如实记下很多人的庐山表现就非常的难能可贵了），彭在庐山会议前后说过的一些欠妥的话也被有心人记住，并一一揭发出来。如此等等，才构成了对

彭批判的完整定性。而其中的参加高饶联盟，搞小集团、里通外国等，更成了将彭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重要法宝。有了这些新帐，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才能振振有词的告诉参加会议的人士，不给彭平反“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参见彭德怀传记组著：《彭德怀全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再说毛认为好的一面，那就是在打倒彭的问题上，林旗帜鲜明的站在毛的一边，通过了毛的“考验”。如果不能通过此一考验，林也不可能顺利取代彭主持军委工作。纵观党史历程，毛对于其下属在关键时刻是否表现出对他的足够忠诚或与其保持一致是极为看重的。当过毛图书管理员的逢先知关于这一问题有一段不错的评述“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总是不会忘记，总要在行动上表示感谢的。但是，谁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即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了分歧，要想照旧得到他的信任，那是很困难的，他也是不会忘记的。”（逢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毛对于他要信任重用的人，这样的考验绝对是少不了的。对林如此，对其他人也多有类似之举，而这些人也必须作出令毛满意的表现，方能通过考验。这样的例子党史上甚多，不胜枚举。如73年末毛极为关注邓在“帮周”会议上的发言情况，即为一例。

以上是笔者在回顾庐山会议这段历史时的一些看法，也请不平兄多多批评指正。■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续霜红

本期校对：邴 风